



2009 年 5 月 14 日第 12 期

总第二十二期

2008 年 9 月 13 日创刊

REMEMBRANCE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国史笔谈

[韩江雪](#) 几点感想——读中文大学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

书评与序跋

[陆小宝](#) 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阎长贵](#) 评叶永烈《“四人帮”兴亡》

史林一叶

[王 锐](#) 文革小报发展繁荣的几个历史片断

[忻鼎亮](#) 中国科大的“雄师”和“井冈山”

风云人物

[王广宇](#) 关锋与郭冲

口述历史

文革与个人恩怨——[茅家琦](#)教授访谈（节录）

蓦然回首

[黄昌国](#) 1970 年春节的记忆

简讯

[宇 锋](#) 一部原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的回忆与研究专著正式出版

文摘

[陈益南](#) 也谈王白旦的故事

小资料

钟 逸 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编读往来

1、王广宇答李自茂 2、庄瑞菁谈丁学良文 3、马小星谈杨银禄文

【国史笔谈】

几点感想

——读中文大学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

韩江雪

一、第六卷以资料取胜。其重要价值，在资料上，不在论述上。就资料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本写文革前三年大动乱的书，在细节方面比第六卷更详细、更准确。虽然有人也提出，第六卷写北京的多，外地的少。但这种要求，对于个人完成的史学著作，未免过苛。以一人之力，是难做到全国尽知的——当然，司马迁是一人独立写成《史记》的，但他是耗费了二十年的心血，一生就写了那样一部著作！

二、当代写史，常见的有美国和日本两种风格，美国是天马行空，纵横捭阖，如剑桥史。日本是严密考证，力求准确。第六卷接近后者，往往能够起到工具书的作用，因此，第六卷在结构框架上。不像通史，更像辞书。如果把此书分拆成若干词条，可能更合适。至于思想性方面和启发性方面，以作者现在的处境，也难说出更深刻的话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还与史学理念有关。

三、第六卷是政治史，而非国史。如论者评这套国史第八卷时所指出的，这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没有摆脱党史的路子。因此，说它是国史，名不副实。说它是政治史，庶几近之。第六卷，主要是写文革政治事件，这一点只要与西方的中国史著作稍加比较就会一目了然。崔瑞德撰写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 年）一书，除了政治之外，对经济、外交、教育、文艺、知识分子及城乡生活也分别开辟专章，做了充分的研究、考察和评价。而这些在第六卷中基本是空白：经济、文艺、城乡生活完全没有。外交，教育、知识分子虽然提到，也是蜻蜓点水，与其对政治的叙述完全不成比例。如，在崔瑞德的书中，1969 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引发的中

苏外交危机，占了整整一章。而在第六卷中，这一世界级的外交大戏，萎缩成三级章节划分中的最后一级。而这个以“珍宝岛事件”为标题的小节，全部篇幅加起来也只有两页半。与此相对应，关于北京四三、四四派的文字倒占了五页之多。再以教育为例。在崔瑞德的著作中，教育占了整整一章，而在第六卷中，教育简化成“教育改革”，并且与“珍宝岛事件”一样，萎缩在一个三级标题之下，其全部篇幅不过五页有余。这种写法显然不是以国为重心，而是以政治为重心。其篇幅文字的失衡，透露出史学理念的混乱和错位。

四、某些章节划分牵强，内容杂乱。比如，前面提到的“珍宝岛事件”，在第六卷中被归入第十章“全国一片红”的第三节“干部下放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下面。明明是一个外交事件，居然与干部和知青搅在一起，其荒谬不经，莫此为甚。还有，前面提到的“教育改革”被放入第六章“大批判”的第三节“造反派的分裂”下面。同样是不伦不类。在“造反派的分裂”这一节中放入“五一三事件”也欠妥，因“五一三事件”冲突的双方是一度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新三军”和一向被首都造反派视为“老保”的“老三军”。说二者是造反派的分裂，不准确。此外，第四章第二节名“大火向厂矿农村蔓延”，却无一小节写到农村，只在“工交座谈会”这一小节的最后提到中央制订出《农村十条》的情况。但并未述及造反之火如何向农村蔓延。还有第五章第二节“一月革命”的第一小节“康平路事件”，此小节置于前一章中应更合适。第九章第三节“新的派性斗争高潮”，最后一小节却是“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显然也不伦不类。

客观地说，造成上述缺陷的，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作者的学术背景和学术训练，使其难以完全脱离党史的旧轨。另一方面，此套国史的策划者、组织者非崔瑞德一类的历史学家可比，其学养和眼光难以使这套“国史”名副其实。以外行之资组织内行，成就这套洋洋大观的史著已属难得，如果对其提出较高的要求，未免过苛。

【书评与序跋】

按：本文是作者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67 届学生孙维藩的《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一书（已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写的读后感，被收入该书作为“后记”。本刊有删节。本文作者陆小宝，男，1946 年生，浙江东阳人，清华

大学冶金系 1965 届毕业生，1970 年毕业，分配到青海西宁，文革后调成都和广州等地工作。1993 年到美国，现居纽约。

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陆小宝

有校友把孙维藩的《清华文革写真集》的书稿从网上给我传了过来，我连夜一口气读完后，第一个感觉是：这些资料实在是太珍贵了。孙维藩是清华大学工物系 1967 届毕业生，书中所载主要是他在清华大学文革中的亲身经历，从 1966 年 6 月 1 日开始，几乎是逐天逐日的日记，加上 200 多幅清华文革各种活动的照片，还有一些当时的大字报文稿。孙维藩书中所记的那段时期，我也在清华园，其中的许多事情，我也都看到过、经历过，所以看他的书稿时感到格外真切。我在清华的年级比孙维藩低，在学校不认得他，至今也没同他见过面。通过书稿，我感到这位老学长真是有个有历史责任感的有心人，感谢他为我们那段复杂而重要的清华岁月留下了真实的记录。孙维藩书中所记的内容看起来十分普通，没有其他许多文革历史回忆中所透露的什么高层内部材料，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场面，甚至没有什么深刻“尖端”的思想观点，它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场景中平民视角的实录；它是一个文化大革命亲身参加者对文革活动无隐无讳的原生态实录；它是当年最高学府知识分子在荒谬笼罩中对前途的真诚探索的实录。

特殊场景中的平民视角

众所周知，清华大学在文革中处在一个不同寻常的重要位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曾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幕后指使者，周恩来曾受命亲自过问清华大学的文革问题，毛泽东曾多次关注清华文革并作过具体指示。清华大学各个系中有不少高干子女，在人们眼中，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反映了中央不同派别高层领导的升迁沉降动态，以及这些派别的政治利益和政治态度。可以说，清华大学文革中一切重要事件都在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的密切注视之下，有些甚至是他们亲自操纵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清华大学是一个最好的窥视口。仔细分析孙维藩的日记，人们

可以寻踪文革中最高层各派力量之间博弈争斗的脉络。

我们看到，孙维藩在文革早期的观点变化很大，文革刚开始时他在农村四清，是忠实于党组织的学生，过几天回到学校，就批判蒋南翔是“黑帮”了；再是跟着工作组“反蒯”，开始他还认为反工作组的同学是“人民内部矛盾”，很快又认识到是“敌我矛盾”了；工作组要撤了，他跳上大礼堂讲台为工作组辩护，不多久他又批判起王光美工作组来了；对刘少奇，开始认为是最尊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紧接着是犯了错误的领导人，再接着又成了坚决打倒、批深批臭的对象了；他本来是积极“反蒯”的，不久，他又参加到蒯大富的井冈山去了，甚至成了井冈山机要部门的成员；再不久，他又反出井冈山，变成了四一四观点了。这样的变化，叫现在的人看起来一定觉得十分奇怪，但对当时的人来说，却是极其正常的现象。作为一个“革命群众”，每步都在“紧跟”，不是孙维藩变得快，而是高层的斗争形势变得快。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到，他前期每一次大的变化几乎都是由“首长讲话”或几篇高干子女的大字报促成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什么“群众运动”，实际不过是中央高层借群众声势在那里互相斗法罢了。这斗法的一招一式，有心的读者从“首长讲话”和高干子女的大字报可以看出门道。所以，孙维藩保存下来的这些原始材料十分珍贵，值得对中国文革史感兴趣的人去仔细地分析揣摩。

国内有位研究清华文革的专家，曾将这种中央和群众的特殊关系定义为“互动”。我认为，“互动”这个名词不恰当，因为它容易混淆彼此的主体责任，不能反映客观事实。还有，一些研究者常把中央文革和群众的关系描绘成“欺骗”和“受骗”的关系，有人说，发动文革的人是骗子，参加文革的人是疯子，底下群众是傻子。对于这种说法，我认为同样也不恰当。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的运动，它的出现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文革初期，中央高层确有人在蓄意挑动群众，运动群众。但运动深化以后，每个人都被各自的利益驱动着，选择他们自认为正确的言行，在充分表演。文革运动并没有按照任何人意愿的方向发展，它反映的是全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合力。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有本事能够自始至终随心所欲地掌控文革运动的方向。

反思文革，祸害全国的主要责任者是在最高层，这是毫无疑问的。学生中的部分干部子弟，引人注目，在文革初期起过一些颇为特殊的作用，这也是有目共

睹的事实。那么，我们这些普通群众，平民子弟学生，是否就毫无责任了呢？我认为，面对历史，要有坦诚的态度。反思文化大革命的责任，我们这些亲历者不能将自己完全置于事外，高层有高层的责任，头头有头头的责任，学生群众也确实有学生群众自己这方面的责任。那时候，我们已经是二十多岁的清华大学学生，是一些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多少还算是知识分子。怎么说“受骗”就被人家骗了呢？难道就没有自己的原因吗？

我这辈子忘不了参加批斗彭德怀时的情景，看到这位不屈的元帅双手被人强扭向后，吃力地弯着腰在台上站着，我却在台下随着大家一起呼口号。文革后四十多年，每回想起这个场面，我一直良心难安。我是农村学生，我亲眼看见了大跃进后农村大饥馑的惨状，我自己也曾被饿得半死，彭德怀为农民鼓与呼，何罪之有？他的政敌要打倒他，尚有理由可讲。我是一个农家子弟，有什么理由要跟在别人的后头起哄！事后，我憎恨自己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放弃了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文革后，我曾经为此写过一首词叫《青玉案》，其中一句是“国内吾人应自愧”。我确实觉得自己心中有愧，我觉得全国人民都该感到有愧。作为一个平头百姓，在运动面前，我们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世故、懦弱、赶潮头，往往还夹杂着一些“要求进步”的投机心理，这些都不是简单用“受骗”两个字就给自己开脱得了的。其实，专制和独裁只有在大多数民众的公民责任心觉醒前才能得以存在，有时甚至是集体纵容的产物。如果我们每个中国人、每个知识分子都能担负起自己的公民责任，文化革命还会搞成这副模样吗？如果今天我们再不反省，还一味抱屈说自己“受骗”，中国的将来还有希望吗？

清华大学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一个特殊场景，而孙维藩却是从一个普通平民的视角观察并记录下来的，它反映了当时绝大多数群众的实际感受。孙维藩出身普通家庭，不是高干，也不是地富反坏右。文革中，他的家庭成员和他本人基本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所记的内容就较少掺杂个人利益恩怨的成分，而较为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的心理和情绪。

在学校里，孙维藩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他关心国家命运，紧跟中央精神，但他没有后台，也不是极端分子，只凭着当时的形势和自己的感觉在一边随波逐流，一边积极地参加运动。他后来是四一四派的，他的战斗组叫“山里红”，也不属于发起四一四串联会的23个核心战斗组之列。孙维藩是5月29日正式宣布

加入井冈山四一四总部的，而这个时候正是四一四面临最严峻考验的时刻：如果530革委会成立，搞分裂绝对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错误。像孙维藩这样的普通清华群众，文革以来一直都是紧跟中央首长讲话和高干子女动向行事的，这一次他们终于开始自我选择方向，而且是毅然抉择了具有较大政治风险的四一四一边。

说起四一四观点，现在研究文革的人似乎马上将它等同于周泉纓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孙维藩的日记还记下他参加“反革命小丑周泉纓批判大会”呢。无可否认，周泉纓当时的某些观点，对抵制文革极左做法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也应看到，周泉纓的认识不能完全代表四一四群众的认识。其实，当时广大四一四派群众普遍反对周泉纓的走极端和妄图做王者师的言行。

本书所录“山里红”一批“井冈山几大怪”的文章，看起来又散又乱，毫无“理论色彩”，还有一些关于蒯大富的流言如“李琴珠怀孕之死”之类，也是似真似假。其实，这些文章和传言都不过是发泄对蒯大富极左做法“看不过眼”和为受压制、受迫害一方“打抱不平”的情绪罢了。这种不满情绪表面看是对蒯大富的，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们是对中央文革的，是对江青等“中央首长”的。当时清华学生中，不少人对文化革命开始产生厌倦、反感和抵触，对“首长讲话”也不再步步紧跟，而是议论纷纷，虽然不会形诸笔墨公开反对（在日记上都不会），但在底下骂两声，在大字报上搞点怪，那是家常便饭。再过一段，许多人越来越失望，热情消失，大字报写得少了，连怪都懒得搞了，干脆“逍遥”，谈恋爱、焊收音机、搞“线路斗争”去了。他们虽然手在“线路斗争”，心中还是放不下“路线斗争”，不时会找人一起讨论形势，巡看学校各派的动向。现在回过头来看，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在广大群众中一种逐渐产生的、尚不自觉的抵制文革的思潮，而不是周泉纓那样致力于为文革寻找另一种正面理论和较好出路的思潮。从这个角度看，研究孙维藩的日记比研究周泉纓的大字报更有意义，因为它如实地反映了民心的向背。

通过日记，大家可以看到：像孙维藩这么忠厚、诚实、上进的知识分子，从紧跟中央精神、积极参加运动，到对中央精神开始玩世不恭、对运动产生反感和抵制的过程，是一天天、一步步、真实地走过来的。而这个过程，只花了区区一、两年的时间。这个事实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文化革命运动在普通国民中，以惊人的速度耗散了共产党和革命领袖长期积累起来的权威资源；迅速解构了经过长

期宣传、教育和灌输才得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正统思想框架。这个变化的速度是惊人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样特殊的政治运动，这样的变化绝对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种变化的作用，更是惊人。如果问，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成果？可以说，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解构，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成果。这个成果是发动这场运动的人所始料不及的，但正是它，一直在制导着中国过去几十年、现在和将来的发展走向。

无掩无讳的原生态实录

孙维藩书中所记的部分文革事态不是发生在清华园，而是他到外地串联时的经历。文革初期，即使在学校里持保守观点的学生跑到外地去，往往也会变得很激进，到处煽风点火，鼓吹造反，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他在 1966 年 10 月跑到黑龙江的一个边远农场，揪斗著名“大右派”丁玲的一段记录，特别引人注目。深入分析他的这一段经历，对正确解读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重重迷团，有着特别的意义。

孙维藩为什么要到黑龙江边远农场去呢？原来他一个朋友叫杜玉玺，是那边农场学校的教师，文革中被打成了反革命，“被斗了三次”，于是孙维藩“决定立即组织队伍北上为他翻案”。去了以后，又是怎么翻案的呢？首先就是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像丁玲这样的大右派却被农场小汽车接进去，住在招待所，生活安排得很舒适，一天仍是几个菜，过资产阶级寄生生活。他爱人陈明是摘帽右派，每月 129 元，不干什么活。还请丁玲教夜校，辅导学毛选哩，简直是笑话！”于是他发动群众，“……宝泉岭沸腾了。革命群众拉出了丁玲、冯万钟游了街。汽车队、机关职员、中学红卫兵搞的。也没什么统一组织，但民情很热烈，得到群众好评和拥护。这次游行是宝泉岭第一次，原他们没勇气，问我可以不，我说民愤太大只要群众要求游就游吧。于是他们要把黑五类全游，我说先重点突出找民愤大的冯大鼻子及得到这儿党委保护的丁玲先游，于是就这么干了。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威风。造反派扬眉吐气了，保皇势力害怕了。”

这种通过“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来解救自己人的做法，在文革中十分典型，孙维藩将它照样学来，套用到了丁玲的头上。但是，当时他能如实地记录下来，

现在又能无掩无讳地公之于众，这却非常难得。它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文革中受迫害者，或预感到将受到迫害者，为了自保，往往抛出比他自己低一层级的“阶级敌人”，变本加厉地加以迫害。他们是受迫害者，同时也是迫害者，结果导致文革的受迫害层面越扩越大，迫害程度越演越烈，而受迫害最深的还是那些处于最低层级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以及他们的子女。这个文革中的丛林生态法则，是解读清华大学乃至全国文化大革命迷团的钥匙。

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工作组进入高校，种种作为，后来遭到毛泽东的批判，他自己辩解这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这种说辞已被现今话语界和学术界普遍认可。但是，事实真相当真如此简单吗？文革的斗争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一点在“五一六通知”上已经确立，刘少奇当然早有准备。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解决刘少奇的问题，这点早有许多端倪可寻。如果说处于当事人一方的刘少奇对此毫无觉察，这也未免太低估刘少奇的政治敏感性了。那末，他采取了什么措施来自保呢？他派出工作组后，立即抛出一大批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作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供给青年学生去批判斗争。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霎时间，清华大学各级党组织被冲垮，几百名大小领导干部被戴高帽、游街、批斗和强迫劳动。这种做法是任何“老革命”历史上从无先例的，总不能说是因循老经验吧？从1966年12月开始，清华有人一直在追问“蒋南翔是被揪出来的还是抛出来的？”其实，这个问题根本用不着问，该认真地问一问的是“蒋南翔是谁抛出来的？为什么要把蒋南翔抛出来？”公平地说，接下去刘少奇决心镇压反工作组的浪潮，进行“反蒯”斗争，将全国几十万学生打成“反革命”，倒真是完全因循1957年反右运动的旧例，不该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使错了，也真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我们这些当年清华文革的亲历者，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怕：如果刘少奇模式的文化大革命得以继续下去，那末我们这些人不就统统当真成了反革命了？我们这辈子不也是随时可以被人抛出来，被人任意凌辱、宰割的“右派分子”吗？现在社会舆论一致公认，57年反右是知识分子的浩劫。那末，怎么能够仅仅因为刘少奇是文革的主要受害者，就掩讳不谈、甚至对他先是抛出大批干部、接着又迫害无辜学生这样一种已经成了事实的、比57年规模更大的知识分子浩劫持肯定态度呢？

再看 1966 年 8 月 24 日，清华人公认这是清华园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就是在这一天被推毁的。这是简单的“破四旧”吗？事实真相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传到清华，敏感的学生猜测到有所指，几天内贴出大量的反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清华红卫兵的几个高干子女，和也是红色后代的中学红卫兵们，为了保护刘少奇和他们的父辈们，策划、秘密串联、调动几十个中学的老红卫兵 2000 余人到清华园，进行镇压，实行所谓的“红色恐怖”。为了保护“革命领袖”，他们照例要大抓阶级斗争，迫害低层次的“阶级敌人”。他们威迫清华中上层干部推倒二校门，并对正在强迫劳动的“黑帮分子”进行毒打。这个场面十分凄厉恐怖，惨不忍睹，许多目击者现在回忆起来都是心惊肉跳。孙维藩这一天的日记，虽淡淡写了一句“然后红卫兵决定撕掉给中央首长的全部大字报，一会儿便付之一炬”，而他拍下的清华二校门倒塌一刹那，以及让“黑帮”们去清理残渣的残酷场面，却活生生地见证了这段历史。十分清楚，这就是这次红色恐怖行动的真正目的。有文革历史研究者经查证指出，正是这次红色恐怖行动，开创了全国打砸抢暴力行为的先河。

再来看孙维藩 8 月 1 日的日记，“从航院传来了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当时文革的邪火正在烧向一批革命老干部，为了自保，必须把这股邪火引开。引向谁呢？当然还是引向较低层级的“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子女。荒谬的“血统论”顿时蔓延全国，所到之处一片腥风血雨，成千上万的人遭受残酷迫害，家破人亡。不知这幅对联的炮制者们现在有何想法。

许多文革中的被迫害者，为了自保，“转移斗争大方向”，以“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为名，引导群众迫害别人，有时他们自己也亲自参加对他人迫害。从被动的受害者转为主动的施害者的手段，文革中司空见惯，屡见不鲜。而今天，孙维藩通过他如何发动群众批斗丁玲的事实，毫无隐讳地讲了出来。这是需要一点道德勇气的。孙维藩有这个道德勇气，很不容易，因为至今许多人，还没有这份良知，也没有这份勇气。他们在写回忆文革的文章时，往往只是写自己如何受“四人帮”迫害，却从来不写自己又是如何迫害别人的。他们只控诉别人，从不忏悔自己。许多作家依此基调创作出一批批电影、小说、文艺作品，以至今天的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脸谱化的文革话语模式，似乎文革中全国各地、各单位突然神秘地冒出一批“四人帮”的爪牙，凶神恶煞，专门整人。这些所谓的文革历史，我们

这些亲历者看起来觉得总不大对劲，显然，还历史本来面目还是十分艰巨的事情。

在荒诞笼罩中的真诚探索

仔细研读孙维藩的文革日记，有心的读者可以梳理出清华文革的主要脉络，并发现：团派和四一四派之间争斗矛盾的主根是文革初期的工作组给种下的。工作组在清华做了两件事，一是抛出蒋南翔，并将清华的 70%党政高中层干部打成“修正主义黑帮”；二是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进行“反蒯”，将大批“蒯派”群众打成了反革命。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做法，毛泽东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委派周恩来亲自过问，1966 年 8 月 4 日周恩来主持开大会给“蒯派”平反。而对工作组将广大干部打成黑帮的做法，1967 年 3 月 31 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清华文革后来分化为团派和四一四两派：团派借毛泽东批判资反路线为动力，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主导思想；四一四则以《红旗》的调查报告为依据，将解放干部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虽然，后来两派的人员组成上互有穿插，四一四中有“蒯派”人物，团派中也有被打成“黑帮”的干部，但两派思想的分野则起源于这两条主根，后来两派的种种争论，甚至残酷的武斗，也基本可以溯源到这两条主根上去。由于工作组是刘少奇派出的，所以，这两条主根其实又可以归于一总根，都被定性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是毛主席大字报定的性，一是《红旗》文章定的性，都是中央精神，都用来打倒刘少奇。那末，为什么清华两派却会斗得如此激烈，难解难分呢？文化大革命的奥妙就藏在这里面。

按照大多数人的常规想法，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搞掉刘少奇，为自己争夺权力。从这种想法出发，当时的《红旗》杂志的秀才们和四一四的学生娃娃“理论家”们，自作聪明地给毛泽东设计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收官”招数：批判刘少奇在干部问题上的资反路线，然后顺势解放干部，恢复秩序，从此“河归旧道”。常人看来，这种做法确实是一着好棋。文革初期，刘少奇工作组打倒大批干部，还有高干子女为转移斗争方向而大肆打人整人，都是证据确凿，天怒人怨，打倒刘少奇后借此结束混乱局面，应该说是非常顺理成章。但是，

出人预料的是，毛泽东不愿意下“秀才”和“理论家”们给他设计好的棋路，他有自己独特的思路。因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仅仅是要打倒刘少奇，他的宏伟目标是打造出一个他理想中的全新的社会来。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他对自己创建的这个社会的政治、教育、文化体制都是十分地不满意。其实，他比谁都早就看出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弊病，他不愿意再朝这条路走下去。他对自己期许的使命是创建一个圣朝的社会体制来。现存的社会体制就像他自己双手捏造出来的一只碗，但那是仿照别人的坯子做成的，现在端起来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他存心将它全部打碎，重新团成泥巴，再捏它一个。做成一个什么新式样的碗呢？这是深埋在他头脑深处的一个美不可言的理想世界，时而清晰，时而飘渺。这个理想世界的成分十分庞杂，有他少年时期信奉过的无政府主义，而后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张鲁的五斗米教，秦始皇的封建制、农民造反的均贫富、西方的乌托邦、东方的大同世界，他也不完全排除民主自由，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之类也在其中，当然最念念不忘的是他自己施行过的“三钱油、三钱盐、一斤半面”式的战时共产主义。这个理想模式具体是什么样子，他自己心里也飘忽不定，只能常常用只言片语来描摹一二。但这个理想世界的诱惑实在太太，他三番五次地公开向全国全党号召，不惜一切代价向这个伟大理想发起冲击。解放后搞的一系列运动，合作化、双百方针，大跃进、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教育革命，反修防修，都是为了这个理想，无奈屡试屡败。

他深感老的一批文臣武将理解不了他的这番宏图，不得力，不肯出力，做官当老爷，没有革命精神了，成了他实现这宏图的最大阻力。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他决心让青年学生“革命小将”打头阵，把一切旧体制砸烂打乱，建设一个他在“五七指示”中粗线条描绘的史无前例的新体制。所以，他宁愿容忍蒯大富团派的“大翻个”理论，放任他们先胡打乱闹地折腾一阵试试。而四一四这种没出息孩子的模样，说来说去，无非让他回到老路子去，这是他老人家最不喜见的。打倒一批干部，那是小意思，让他们多挨挨整怕什么，以后选些得力的人再上来就好了。武斗死人，甚至内战，在毛泽东看来也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指挥过双方投入几百万军队的大战，几十万几十万地死人，结果天下打下来了。今天为了那个宏伟的理想社会目标，再死个几千、几万人，不值得大惊小怪。几个秀才“理论家”要给毛主席支招，实在是有点自不量力了。你们的那点小伎俩，哪能

放在毛泽东的眼里！把文革初期搞乱的责任全推到刘少奇一个人头上，他老人家根本不屑玩这种小招术，因为这么一来，不仅会坐实了外界关于文革就是打倒政治对手的谣言，而且文革“斗批改”新事物都没弄出个名堂就匆匆收兵，就是承认自己对理想社会冲击的又一次失败。所以，毛泽东竭力反对刘少奇工作组在学生问题上的资反路线来鼓动文革，却不情愿因反对刘在干部问题上的资反路线来过早地结束文革。**四一四思潮的理论总是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前面我们问过“蒋南翔是谁抛出来的？为什么要把蒋南翔抛出来？”很难想象，刘少奇抛出蒋南翔时，毛泽东完全不知情，很可能是他们通过气，双方同意才抛出来的。其实他们心里谁都不会真正认为蒋南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完全没有什么可信的事实根据。为什么还要将他抛出来呢？**他们两个人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对刘少奇来说，这是政治策略，为了自保，为了引开祸水。除此外，很难作别的解释，因为在刘的思想体系中，找不出蒋南翔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对毛泽东来说，这是政治理想，是为了教育革命。因为按毛的理想，蒋南翔的一套教育方法简直是完全不合他的心意。他和刘两人虽然动机不一，先搞乱了再说，却是不谋而合。这里我不是说，毛泽东的动机，就一定比刘少奇的动机要高尚多少。无论什么动机，整了这么多的人，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这么大的苦难，都只能说是历史的犯罪。

毛泽东是一位权谋家，也是理想家。可以说，文化革命就是权谋和理想相结合的产物。有必要指出，搞权谋不一定卑鄙，有理想也不一定就崇高，它们各自都可能造福人民，也可能祸害社会。关键是，一旦失去人性和人权的道德底线的约束，将权谋和理想两者结合起来，却会对人类文明形成最大的破坏力。我认为，这一点，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推崇理想主义的品格，只要为了理想，似乎一切不择手段的行为都可得到容忍和原谅。文革中许多骇人听闻的恶行，都是在理想主义的掩护下进行的。自以为真诚的理想，为行恶者解除了心理障碍，使恶行更加肆无忌惮。大家都记得，文革初期，任何丑恶的行径，只要冠上革命的名义，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畅通无阻。文革中有不少热血青年就是被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所吸引，钻进“四人帮”的“理论”怪圈中去的。清华有一些很有天分的同学做出一些显然违反常理的举动来，其原

因也在这里。纵观世界历史，理想主义侵害人类文明的例证屡见不鲜。今天，我们再也不应该盲目崇尚理想主义了，但是，也不能就此摒弃理想主义。只有那些在总结历史教训中，找到并把握理想主义的现实基础和道德基线，还能坚持远大理想的人们，才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中坚。

毛泽东的理想社会是虚渺的和荒诞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有必要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包括清华大学，确实有一批人在真诚地、勇敢地探索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没有变。这一代清华学生，仍然是全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和正义感，同“五四”和“一二·九”时的清华学生是一脉相承的。这一代年轻学生从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思想正统教育，开始思想确实比较封闭，容易上当受骗。政治运动的残酷和险恶，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清醒。而文革初期提倡的大民主和造反精神，对他们来说，反而成为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思想空前活跃，班系的界限打开，自由组合成许多“战斗组”，有些战斗组其实等于读书会。马列原著、鲁迅作品、西方经典哲学、政论和文学名著，一些供高级干部参阅的内部书刊，甚至秘密文件（如赫鲁晓夫二十大报告，彭德怀万言书之类）从各种渠道流到学生手中，大家一边传阅，一边讨论。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融汇一起，思想互相碰撞，学会了独立思考，迅速成熟起来。

他们中有的人在主观上虽尚不自觉，客观事实上在群众中组织起一股抵制文化大革命极左做法的力量；有的人退出运动，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中进行冷静的观察。他们在反思文革和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中，看到了十七年旧体制的诸多弊病。他们反对“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套极左路线，也不愿意退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旧体制去。当时，他们中的少数人已经朦胧地感觉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应该补资本主义的课，应该走一条更为务实的道路。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我是亲身经历的。现在的人或许不相信，下面我引周泉缨 1967 年 10 月 24 日大字报上的几句话来作证明：“逍遥派中一些人是一直在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古今中外的一些文件书籍的。他们在这里下的功夫很大。他们不仅这样深入细致地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且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我是很尊重他们的。他们是小人物，似乎是默默无闻的，对小人物不要蔑视……”

打倒“四人帮”后，清华大学一批文革时期经受了考验的运动积极分子，以

及一些默默无闻的“逍遥派”学生，坚决拥护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许多人成了“改革开放”的骨干和领头人。文革时期在校的几届清华大学毕业生，文革后在中国各级党、政、经、学各界担任要职的人数，比任何别的时期都要多。这绝不是偶然的。这几届清华学生对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目前我们国家和清华大学本身的现任一把手，都是这几届清华毕业生，这就很说明问题。

当然，这几届清华学生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远远不能单用多少人在体制内做了大官来衡量。文革中默默无闻、探索中国前途的小人物，有些在文革后做了大官，有些现在还是小人物，有人甚至为此受了不少挫折，遭到不公正的待遇。现在，他们中不少人还在无怨无悔地探索着，这些人是这几届清华学生中最可敬的英雄。公正地评价文革中几届清华学生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清华大学校史工作应尽的职责。但是，清华大学校庆 90 周年，有关方面总结清华大学历史时，对清华在文革这几年的发生的事情讳莫如深，寥寥几笔带过，似乎这几届学生在学校中做的事都是见不得人的，实际上是无视，甚至抹杀了清华这几年对社会的重要贡献。这样的认识和态度，实在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

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文化大革命后，研究文革一直是中外学术界的重要课题。应该说，前些年中国人民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是卓有成效的。通过批判文革极左思潮，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取得空前的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和世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也应该看到，多年以来我国对文革的研究一直采取“淡化处理、全面否定”的态度，对文革的批判普遍存在着标签化、漫画化的现象。至今，有些事实的真相还没有完全揭秘，有些事件的过程还没有梳理清楚，有些思想、文化层面的经验教训还没有认真总结。现在社会上甚至出现一些“极端逆反”的文革后遗症现象。比如，文革提出“反对干部特殊化”，现在领导干部的贪污腐化愈演愈烈，腐败已经到了事关党和政府生死存亡的关头；文革中提倡“道德新风尚”，现在全国存在着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为金钱可以不顾廉耻、不择手段，社会道德风气已经快要守不住最后的底线；文革中提倡“为理想献身”，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普遍流行犬儒主义，只关心自己的升官发财，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文革时，我们国家走了一个极端，现在反其

道而用之，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这不是一个成熟社会的正常现象。更加深入地研究文革，对克服这些文革后遗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同时，在思想、文化的层面研究文革，对确定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也具有深远的意义。现在有人呼吁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提倡西方的民主政体。我个人十分赞赏民主政治，但是也隐隐地担忧：民主政体这个好东西，搬到我们这个国度里来会不会变质？文化革命时在清华园，我们搞过“无产阶级大民主”，试行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团派和四一四在一定程度上也相当于两党制。结果怎么样呢？大民主成了无政府的大混乱，自由选举成了“揭老底战斗队”的“大家臭臭”，“两大派”最后演变成刀枪相见的血腥武斗。美国的民主政治建立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基础上，它提倡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尊重自己的人格，也尊重别人的人格，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责。来看看我们的国民性：文革中的造反英雄没有真正的独立思想，往往是猜测中央动态的押宝投机，而只要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不择手段，为了避免自己受迫害就可以牺牲别人、变本加厉地迫害他人。文革后，很少有人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人们往往只控诉自己如何受迫害，不忏悔自己怎么去迫害别人，把一切责任都往“四人帮”的筐里装，把自己所作所为统统归为上当受骗，振振有辞地说是“人所共知的违心行为”。这样的国民性如果不反省、不改变，谁敢保证在中国搞自由选举和两党制而不会重蹈文革的覆辙呢！

在美国，我深深地感到，尽管文化革命已经过去多年，它始终是一个淡化不了、回避不过的话题。我有一位业务很平庸的台湾同事，当听到文革期间我正在北京读书时，脸上不禁显露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因为在他的印象中，北京的红卫兵不是抡着皮带打人，就是围着圈跳忠字舞，都是些道德和智力有问题的人。还有一次，我所在高中的老师进行业务学习时，辅导老师拿出一叠写有“红卫兵”、“四人帮”等字样的卡片来向教师们示范怎么教中学生掌握名词概念。当然，美国也有一些很严肃的学术机构在专门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女儿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她们的一位名教授开了一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程，去修这门课的学生十分踊跃。还有我听说过，一位正在攻读历史专业博士生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清华大学文革井冈山红卫兵两大派分裂的原因分析”。这些教授和专家有研究历史的专业方法，但他们没有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所能收集到的资料也只能

是已见诸文字的史料，从文字到文字，难免会有些片面和失真的地方。我们是文化革命的亲历者，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过去的行为都已成了众人评论和研究对象。与其让旁人或后人来猜测我们、研究我们，我们何不自己站出来反省自己，解剖自己。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把自己的心路告诉后代，向历史作一个交代。

有人说，真正认识和评价文化革命现在还为时太早，重大历史事件需要时间的距离感，才能看得明白。我认为，这种说法或许有理，但历史可以等待，我们却不能等待。我们亲身经历和见证文革的这一代人，老之将至，许多人已经退休，有些人甚至逐渐失去了追忆往事的能力。许多事件的具体情景，尤其是我们当时的思路 and 心态，如果再不抓紧记录下来，就可能永远湮没，永不会被后人所知。从目前反思文革的情况看，中学红卫兵写的回忆文章较多，大学红卫兵的回忆还不太多，清华大学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就更少了。我看到有位文革研究者在他的文章中说：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出尽风头，但在反思文革、否定文革的行动中却乏善可陈。这个评论无论是否中肯，对我们都是一个警策。

我们这几届清华学生是不幸的，政治运动虚耗了我们最宝贵的青春和才华。我们这几届清华学生也是幸运的，我们近距离地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宏大、最荒诞、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场政治运动。但我们没有消沉，在相当长的一段艰苦生活中，在冷静的反思中寻找中国的出路。文革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事业有成，有的人还官居高位，退休后不少人已经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了。文革运动搞得天下大乱，害了这么多人，死了这么多人。我们的一些同学就在清华大学的百日武斗中失去了生命。每想起他们，我们心中都会产生出一种锥心的伤痛。为了死去的他们，为了未来的后代，我们应该利用渐逝的老暮之年，把我们当年那段亲身经历说出来。只要我们说的是真实的，就会有价值。只有我们说的是真实的，才会有价值。真实的东西，只有我们将它们说出来，才会有价值。当时你属于什么派，是保守还是造反，是老团还是老四，并不重要。史识可以不同，史实只有一个。真实与否，不能任人雕刻；正确与否，听凭后人评说。真实比正确更重要。为历史，为后代留下真实的记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2007 年 12 月于纽约

【书评与序跋】

评叶永烈《“四人帮”兴亡》

阎长贵

2009年2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叶永烈180多万字的《“四人帮”兴亡》。

作者在“序言”中说：“我希望本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具有一定史料价值。”还说，我的写作，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对历史负责，对党和人民负责”。

本书《内容介绍》称：“纪实长篇《“四人帮”兴亡》是作者花费二十多个春秋，经过广泛采访，终于完成的长篇新著。”“本书是今日中国关于‘四人帮’的唯一鸿篇巨作，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史著，是一部畅销性的畅销书，相信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出版社在新书推介中说，本书经党史权威部门审读通过，是关于“四人帮”的重要的“纪实长篇”，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扛鼎之作”。

此书内容不断被报刊转载，有份文摘报摘登此书的段落时，在说明中指出：“作者叶永烈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希望对于‘四人帮’兴亡史的深刻揭露，批判极左思潮，防止‘文革’卷土重来。”

然而，在我看来，这部书恐怕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觉得，对这部书，从总体上讲，或者说，从不少方面讲，还不好以“纪实”和“对历史负责”相许；换言之，对这部书，恐须慎重对待，不要误导读者和人民群众。

叶先生开系统地批判性地写“四人帮”的先例，这是值得肯定的。他的书有不少论断能给人以启发，如它在分析“四人帮”时，说江青是首领，张春桥是“智囊人物”。王洪文的“位子”，张春桥的“点子”，江青的“旗子”等等。在事实方面，也有符合事实的地方，也有澄清错讹的地方。比如，它在毛泽东1948年在河北阜平城南庄脱险问题上，否定了聂荣臻元帅的说法，而肯定了陈伯达的说法。这种既不因人废言，也不因人废事的态度和做法，就很值得称道。该书说：

“所有有关人员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秘书，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笔者在1989年采访陈伯达时，也说及敌机飞近时，他急忙朝毛泽东住房跑，遇上江青。陈伯达问江青：‘主席呢？’

“江青答道：‘在屋里，说服不了他！’

“陈伯达跑进院子，大声高叫：‘飞机来啦！飞机来啦！’

“陈伯达进屋，催毛泽东快走。这时，卫士们架起毛泽东往外走。

“尽管种种回忆录中都没有说到陈伯达也在场，但是陈伯达的回忆是可信的……”（后面几字是笔者为强调而加粗的）

叶先生是我看到的第一个肯定陈伯达关于救助毛泽东城南庄脱险回忆的作家。从而为客观公正地了断这桩历史公案做出了贡献。

但是，叶永烈这部书在不少地方，不少问题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或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比如，该书《第十一章 江、张、姚密谋批〈海瑞罢官〉》。这样说，符合历史事实吗？我们先看看该书的具体说法：

“批判《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根导火线是怎样点燃起来的呢？

“最早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的，是那个自称‘在文教方面’的‘一个流动的哨兵’的江青。”

“江青在 1962 年下半年就想批《海瑞罢官》，由于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只得作罢。

“直到 1965 年春，江青得到柯庆施的支持，通过张春桥结交了姚文元，她才把‘文革’的导火索点燃起来。”

这就是该书关于 1965 年 11 月 10 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观点和论断。说江青把批判《海瑞罢官》这根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点燃起来”了，这是历史事实吗？能够这样说吗？我们知道，已不少人写书或撰文披露了姚文元这篇文章出笼的实情和内幕，叶先生在“二十多个春秋”里一点都没注意到？一篇都没看过？

柯庆施在批判《海瑞罢官》中的作用，我没研究，没有发言权。但在批判《海瑞罢官》问题上，不谈毛泽东，不谈毛泽东的作用，我认为，是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不错，1967 年 2 月 3 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是说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卜伟华在《“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一书中说，对毛泽东这个话

“不能当真”。我同意这个看法。因为，毛泽东说这话不到三个月，即 1967 年 5 月 1 日他再次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又说：是他建议江青组织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的。他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毛泽东这话有白纸黑字的文献证明，谁都没法否认。1967 年 4 月 12 日，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中批评上海市委的一些人时说：“本来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再者，“九大”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毛泽东“发动”的。毛泽东把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看作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他又不止一次地说，文化大革命的火是“我放起来的”，在如此明明白白的事实面前，叶先生说什么“江、张、姚密谋”岂不是太没道理了吗？

又如，该书《第十五章 张、姚、王发动“一月革命”》。如同我们上面提的问题一样，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发动“一月革命”，符合历史事实吗？不容否认，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发动“一月革命”即上海夺权中，起了重要作用——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前线指挥，不管他们出了多少主意，想了多少办法，包括使用了多少阴谋诡计，他们都是具体执行者，决策者不是他们——决不是他们，这点到现在应该说是清清楚楚的了，不能、不需要、也没法再掩饰了。

1966 年 12 月 27 日，姚文元打电话告诉徐景贤：“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很高兴，……主席对上海的形势很关心，他从中央文革的《快报》上，看到了你们造反的消息。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主席很欣赏你们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平！’他说，‘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毛泽东叫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回上海，去掌握上海的局面。张春桥、姚文元做了一些准备工作，1967 年 1 月 4 日才回上海。（参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4 年第二版第 7—8 页；《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64、781 页）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根据毛泽东生日谈话写成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同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月2日,毛泽东同即将回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指出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996年版第181页)

1月4日上午,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下午接见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的徐景贤、郭仁杰、程绮华、朱永嘉、吴瑞成、王知常等,张春桥说:

写作班的造反在上海、在全国的影响都比较大,推动了全国省、市一级的党政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最近,中央文革正在起草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条,里面也吸收了你们的经验。毛主席在接见中央文革的成员时,肯定了你们的造反,文元已经给你们传达了。所以,今天想先见见你们……

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来,是中央文革派我们来的。我们两个来了当然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联络站就是我们的工作机构。我们到上海来的任务,是做调查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所以我们不想介入上海的具体活动,同时,我们到上海来的消息,暂时也不想公开。你们的工作还是按照计划进行,不必等我们。(徐景贤《十年一梦》第25—26页)

1月5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工总司”的负责人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叶昌明、蒋周清等十几个人。接见时张春桥说:

上海的两百万产业工人,是我们的基础。上海的工人阶级要能够左右上海的形势,工人运动不要受红卫兵特别是外地学生的操纵。这就是我和文元

到上海以后首先要接见你们的原因。

现在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要害部门都控制起来，包括海港、铁路、电厂、水厂、煤气、电话等，你们看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接见接近尾声的时候，徐景贤接到《文汇报》的“星火燎原造反总部”接管了报纸的报告，并且公开出版了接管后的第一张报纸，报纸上面赫然刊登着各群众组织共同起草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接见结束后，徐景贤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张春桥、姚文元。张、姚感到这件事情来得比较突然，没立即表态。张春桥边翻报纸边说：“这件事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呀！”徐景贤说：“我也没有听说，连发表各个群众组织联合署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也没有先打一个招呼。”姚文元建议：“这件事要向中央报告一下。”张春桥点头同意。

在这次接见会上，张春桥还修改了徐景贤等人给王洪文起草的1月6日“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重点发言稿《揭发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他颇为得意地跟徐景贤说：

你们找到的常委会围攻我的那次会议记录，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当时，他们一个劲反对我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条，特别是承认“安亭事件”是工人的革命行动这一条，责问我为什么事先不跟市委打招呼就签字同意了。曹荻秋还指责我这样做使市委陷于被动，说什么张春桥到了中央文革工作，还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书记嘛！言下之意，要我和他们站在一起。我当场在常委会上就顶了他们，我说：工人运动起来了，我们不要做陈独秀！陈独秀当年就是压制工人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后来我回到北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保护我，肯定了我的做法，主席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嘛！……刚才，我已经把这些情况补充修改在稿子上了，你们再看看吧！（参见《十年一梦》第29—33页）

同日，上海解放日报社造反派宣布接管《解放日报》。

1月6日，上海一百万人（报道说十万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的文件和发言都由张春桥、姚文元审查修改过；大会召开时，张、姚在他们的秘密住处收看电视实况转播。在这次大会上陈丕显、曹荻秋被揪到台上，还有上海数百名局以上干部陪斗。大会宣布三项通令：

- 一、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 二、勒令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七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
- 三、请求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根据张春桥的布置，徐景贤把当天大会的发言稿和通令报送毛主席和党中央。姚文元写了《情况简报》，其中说：

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马、梁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市长、市委书记，曹监督劳动、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完全垮台了。（参见《十年一梦》第 33—40 页；《大动乱的年代》第 182 页）

1 月 8 日，毛泽东召集有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胡痴等人参加的会议，高度评价上海的夺权活动。他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 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这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参见《大动乱的年代》第 184 页）

1 月 9 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经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全文如下：

上海《文汇报》1 月 5 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攻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

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个按语的起草人王力说：“这个按语的影响不亚于聂元梓的大字报，甚至更大。”（参见《大动乱的年代》第 184—185 页、《王力反思录》第 781 页）

1 月 10 日，毛泽东批示《紧急通告》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指出：“此两件很好”，请文革小组“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6 页）

1 月 11 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贺电，周恩来主持政治局讨论时，毛泽东到会场，提出贺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个名义发出（《周恩来年谱 1949 - 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2 页注：“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审阅时加的。”）。贺电赞扬：“你们在 1967 年 1 月 9 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参见《大动乱的年代》第 186 页）

贺电表明毛泽东支持上海夺权。徐景贤说：“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党中央和毛主席第一次用文件形式正式表态支持群众组织的联合夺权。”（参见《十年一梦》

第 45 页)

1 月 12 日，上海举行“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张春桥、姚文元身着军装出席大会，发表他们返回上海以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说。这个大会通过一项“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组织联络站的倡议”，其用意是想以各群众组织联络站作为新的上海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参见《十年一梦》第 46 页；《文汇报》1967 年 1 月 13 日）这也表明了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的造反派对中央贺电的理解。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给上海造反派的贺电。

1 月 14 日（有说 1 月 15 日），“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团体‘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誓师大会”在工人体育场举行，有 10 万人参加。在这个大会上，陈伯达讲话，说自下而上，只能监督，不能夺权。我们如果用监督的形式就更好、更主动一点，当然个别地方、个别机关也可用接管的办法，但大量的不要用接管，大量的接管是要上当的。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周恩来讲，赞成陈伯达的意见，说要“防止接管风”。毛泽东听到这个情况，马上开会批评陈伯达。毛主席说，上海造反组织起来夺上海市委的权，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呢？就是要夺权，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手里夺权。毛泽东就这事讲了一大篇道理，主要内容都在《红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中。主席说，上海夺权的口号是对的。（参见《王力反思录》第 967—968 页；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53—354 页）

王力说：“到一月中旬毛主席夺权概念形成以后，毛主席要我通知张春桥，要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上海新建立的政权机构，要他们去亮相，作为领导班子三结合的成员。”（参见《王力反思录》第 764 页）这表明毛泽东已下定决心把上海市交给张春桥、姚文元领导。

1 月 16 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同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根据毛泽东 1 月 14 日批评陈伯达的谈话写成。毛

泽东批示：“写得很好。”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肯定上海造反派夺上海市委权的文件，即批准上海市的夺权，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号召夺权——“全面夺权”的文件。这篇文章说，上海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篇文章还传达了毛泽东界说和论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性质的话，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这篇文章的起草者之一王力说，这篇文章“影响太大，实际上是新的《五一六通知》。”（参见《王力反思录》第 968 页）

再举一个例子。叶书在讲到 1976 年 10 月 6 日粉碎“四人帮”抓江青的时候，引述了江青秘书刘真的目击回忆：

“当张主任（引者注：指张耀祠）带人冲进来时，我们全吓坏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不一会看见江青被两个女战士拖出来，她脸色腊黄，头发散乱，又喊又叫，我才明白，她完蛋了。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谁也没有去帮她。

“我忽然想起她计划明天上午去清华大学视察，还要作重要讲话。让我连夜写好讲话稿。我追上去问：‘你明天讲话稿还要吗？’

“江青翻了翻眼皮说：‘不要了，撕了吧。’

“江青又说：‘你告诉李讷，不要找我。’

“她还想说什么，被女战士用力拖走了。……”

叶先生所引述的这段所谓刘真的目击回忆，真是绘声绘色，活灵活现。然而，这是真的吗？叶先生是直接采访过执行抓捕江青的当事人张耀祠的，了解了具体抓捕江青的情况，其叙述我认为也是正确的（因为这件事情我也问过张耀祠，我所了解的和叶先生所叙述基本一样），怎么又引出来这么一种刘真的所谓目击回忆呢？请问叶先生，你自己相信这是真的吗？不错，刘真是当过江青的秘书，但那是在 1973 到 1974 年，而不是 1976 年，1976 年担任江青秘书的是刘玉庭。关于这段所谓刘真的目击回忆，我问刘真本人，他说他既没见过叶先生，也没做过

这种回忆；他说，如果我要回忆，我也不能无中生有地编造什么江青“头发散乱、又喊又叫”啊？至于说什么江青让我起草她到清华大学视察的讲话稿，更是无稽之谈；“老哥”（因为我们很熟，他常这样称呼我），你这大学毕业生当她秘书时都没叫你起草过讲话稿，她怎么会叫我这中学生起草讲话稿呢？叶先生的这个演绎完全背离事实。

可以举的例子还不少。叶先生的《“四人帮”兴亡》这部“纪实长篇”在不少问题上，没有做到实事求是，没有做到“对历史负责”。

准确地说，叶先生的这部作品是“演义”——那自然另当别论。不过，对于“演义”，作者、出版社以及“有关评论者”就只好弄出“铁肩担道义”的架势了——虽然那才是真正的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

2009年4月于北京

【史林一叶】

文革小报发展繁荣的几个历史片断

王 锐

中国革命博物馆“致红卫兵公告”推波助澜

1966年9月初，在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大门旁边，贴出了一份引人注目的题为《致红卫兵战士们》的“公告”。可以说，这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发布的一封“致红卫兵的公开信”。全文如下：

致红卫兵战士们

敬爱的红卫兵战士们：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猛烈进攻，印发了许多倡议书、呼吁书、通牒、刊物、宣言、传单等宣传材料。

我们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为了使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代代相传,代代相颂,需及时征集上述这些宣传材料,作为最珍贵的文献收藏,供陈列展出和研究参考之用。请你们这些革命小将大力协助我们,帮助我们宣传,帮助我们搜集各学校、工厂、企业、机关单位张贴和印发的有关这类文献,随时送给或寄给我馆二至四份。不胜感激!

此致

敬礼

中国革命博物馆

1966年9月

地点:天安门前中国革命博物馆北门 电话 637365

一望而知,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意图十分清楚,这就是以征集“文献收藏”的名义,向社会公开征集当时已开始露头,并有发展趋势的红卫兵的宣传资料,其中包括倡议书、呼吁书、宣言、传单、刊物等,甚至还包括“通牒”、“勒令”之类。

中国革命博物馆是国家专门搜集、整理、收藏并展示中国现当代革命历史资料文献的权威机构,其身份十分特殊。其形象及举措,在国人心目中也很特别。虽然,作为历史文献资料征集收藏者,有责任和义务收集保存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及共和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文献资料。但仔细分析,这份“公告”的宣传,却是迎合当时的文革形势及红卫兵思潮的。它不单用赞扬语调对红卫兵街头造反,打砸抄烧等所谓“破四旧”举动予以肯定,而且将红卫兵印刷制作的带有狂热的极左思潮,煽动造反破坏的各类宣传品,称之为“最珍贵的文献收藏”。甚至说,要使“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代代相传,代代相颂”,要将其作“陈列展出和研究参考之用”。显然,它是将这些东西,同早期中共党史文献资料,红军时期的标语传单,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等不同时期的相关宣传资料同等视之的。

在此前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 and 机构，也曾贴出类似“公告”和“启事”，公开征集红卫兵印刷的各类资料文献以作馆藏。但图书馆这类单位，显然不如中国革命博物馆更有吸引力。仅就“革命文物”、“革命文献”这类带有耀眼光环和充满政治含量的字眼，就足以使狂热的红卫兵更加热血沸腾。

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这一“公告”，无疑成了助长各类红卫兵宣传材料进一步发展的兴奋剂和催化剂。“公告”中提及的主要是倡议书、呼吁书、宣言、传单、刊物、通牒之类，当然其中也包括红卫兵小报在内。不过，1966年9月初，公开创刊的铅印红卫兵小报，哪怕是在首都北京，也为数甚少。所以，这份“公告”中尚未直接提及。也正由此，反过来更刺激了红卫兵小报的问世。仅北京而言，9月份创刊的红卫兵小报，就有“首都三司”的《首都红卫兵》、中国人民大学“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办的《红卫兵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办的《红卫兵报》、北京矿业学院首都红卫兵指挥部办的《红卫兵战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红旗》、首都红旗联合总部的《红旗战报》、人民大学赤卫队工人大队的《无产者》、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的《红旗战报》等。

尽管这一公告也出现在北京其它一些地区，但是，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此后发布的征集“造反派小报”的信息相比，后者的影响要比前者深广得多。但是，这一公告对红卫兵传单、小报、刊物等“红卫兵文献”的发展，毕竟起了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从保存收集文献资料这个角度来讲，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确实也收集保存了比较丰富的红卫兵文献。

“大动荡”“大夺权”，迎来小报大发展

在文革中，1967年无疑是极为重要，也极为关键的一年。

夺权运动的全面展开，给红卫兵造反派创造了空前的机遇。造反派（毛泽东一系列谈话中，明确将造反派称为“左派”或“革命派”）成了掌权派，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与此同时，它也为小报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空前的机遇。这一方面是因为，造反派成了掌权者、主流派，原来限制小报出刊的障碍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创办出版小报的外部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促进了小报的发展。另一方面，局势的发展变化，需要红卫兵、造反派更加

重视舆论，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摇旗呐喊。这是小报在 1967 年得以快速发展，进入繁荣期的内在因素。

从这个角度看，1967 年在大动荡、大夺权的背景下，文革小报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乃是时势所趋，是历史的一种必然。

各级党报停刊后留下大片“新闻真空”

1967 年初开始，红卫兵造反派自办小报得到超常发展，其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环境因素，就是从 1966 年底到 1967 年初这段时间，代表官方舆论的各级党报，在文革大势冲击下，纷纷被迫停刊，从而留下了一片极大的“舆论真空”。各种造反小报的崛起，正是顺势而起，意在填补（如果不是试图完全取代的话）这个“真空”。

从 1967 年 12 月份开始，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各级地方党委的巨大冲击，使之先后陷于瘫痪半瘫痪状况。首当其冲的各级党报，更是被报社内外造反派视为必先争夺的“桥头堡”，一些省市报社甚至被红卫兵造反派强行进驻。在这种状况下，大多数党报已无法正常出刊，在造反派夺权前，已被勒令停刊或被迫停刊。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 1967 年 1 月 3 日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通知说，最近，有些省市的报纸，停刊闹革命，这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报纸停刊后，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航空版也停止代印，这就不对了。中央的通知要求各省市报社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正常印刷和发行。（《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 178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中央这个通知，实际上变相认可或被迫接受了各省市党报被红卫兵、造反派接管停刊的事实。

地方党报既已停刊，在报纸舆论方面，一下子留下巨大的“真空”。即便是停刊一段时间后，各级党报由造反派夺权掌权，改刊出“电讯版”，勉强维持出刊状态。但“电讯版”党报只转载新华社电讯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文章，地方新闻仍然是空白。而当年的“地方新闻”这一块，恰恰是能反映当地文革局势，以及传达贯彻造反派观点意图的阵地。在当地造反派看来，反映当地

文革形势发展的地方新闻版不但重要，而且不能缺少。夺权后出刊的正式官方报纸不能为自己服务，自然就寄希望于自己办的小报了。

从各省市的现实来看，正是各级党报不能正常出刊（停刊、复刊、又再停刊，如此反反复复）的 1967 年中至 1968 年上半年，这一段中国新闻史上最不正常的时期，成了小报快速发展并走向“兴旺繁荣”的“黄金时期”。

对于各级党报不能正常出刊，因而造成文革小报的应运而生以至发展繁荣的事实，连最高领袖毛泽东也这样认为，而且予以认可。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国来访者，谈及中国当时的文革形势，以及遍地开花的红卫兵、造反派小报时，就带点赞同又带点无奈地说：“为了争夺报纸，争夺舆论机关，斗争可激烈了。比如《湖北日报》，这一派夺过去，那派再夺回来。然后大家都不赞成，根本不出报，那么就出很多小报。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都有报纸。”（古阳木《红卫兵小报兴亡录——中国报刊史上的乱世奇观》，载《重大决策档案·往事卷》，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

显然，毛泽东将正规党报不能正常出刊，看作是小报繁荣的主要原因。不过，笔者以为，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因素，还是在于文革运动大背景下的时势发展变化，将红卫兵、造反派推上了历史舞台，让其扮演的不仅是“文化大革命先锋”，而且是“救世主”的角色。而红卫兵造反派根据其角色转换和政治理想、政治目的，又迫切需要小报这种舆论宣传工具来宣传自己的立场和政治主张，以便争取和控制社会舆论，进而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人民日报》“启事”火上加油

1967 年 1 月，当“一月风暴”从上海刮向全国时，造反派们如痴如醉，欣喜若狂，大规模的夺权行动，在各地如火如荼地普遍进行着。各种小报的创办、出刊，也渐至进入了“快车道”。夺了权，造反派从“受压者”，摇身变成了“掌权派”。所谓“夺权”，当时的提法是“党政财文大权都要夺”。夺了权，办小报所必需的人、财、物，都由造反派掌握控制，可自行安排支配。这是小报得以发展的物质条件。

1月底，正当红卫兵、造反派自办的小报在各省市自治区呈遍地开花之势，但直接面对它的地方当局（尤其是1月份开始正式介入地方文革运动的各地军方人士），尚对其前景持某种保留存疑态度之时，一向代表中央立场观点的《人民日报》，突然作出了一个很出人意料的举动。1月29日，《人民日报》在第4版左下角，以“人民日报社”的名义，刊载了一则很特殊的《启事》，全文如下：

启 事

为了更好地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本报征求全国革命造反派办的报纸，望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大力协助，及时把你们办的报纸每期寄十份到人民日报社来。

人民日报社

尤其让人惊讶的是，似乎是怕这条《启事》引起的重视不够，两天后的1月31日，《人民日报》又在第三版将这则《启事》再登了一次。这连续的举动，就显得不同寻常了。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一向代表中央的立场观点与形象（文革开始后尤甚，因为代表各地方党委立场观点的省市党报被视为不值得信赖，甚至“反动”），这份《启事》确实很令人吃惊。

这份措词简短的《启事》，其实包含深刻复杂的政治内容，其倾向性，以及这种倾向性背后的政治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它肯定及支持“革命造反派”及其所办的报纸，并（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作公开征集。其理由是“为了更好地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人民日报》以党中央机关报的名义，将“造反派”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划了等号。这实际就是明明白白告诉全国、全党、全军，造反派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过来说，谁反对造反派，亦即等于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

此时执掌《人民日报》的，是半年前的1966年5月31日晚上，陈伯达带人突然进驻《人民日报》夺权的工作组成员之一，原《解放军报》副总编唐平铸。不过，《人民日报》作出如此重大表态性举措，恐怕不是唐平铸敢于做主或能够

做主的。想来，必先经过了代表充当宣传及意识形态总管的陈伯达的点头认可，而陈伯达，想必又事先摸清了毛泽东的意图（甚至是授意），也才敢如此“胆大妄为”。前文已述，由于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极力推荐，此前，毛泽东已开始关注红卫兵、造反派的小报，且对其兴趣渐浓。

按王力的说法，毛泽东关注红卫兵小报的时间似乎在《红旗》杂志 1966 年第 13 期社论发表之前（该期杂志出刊于 1966 年 10 月 2 日），就已经十分关注红卫兵小报了。王力在文革后的 1983 年 7 月对访谈者说：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 年 7 月 29 日，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44 页）

不过，笔者对王力所谈的毛泽东关注小报（“甚至天天看红卫兵小报”）的时间存疑。原因在 1966 年 9 月，红卫兵小报才开始创刊，即使是北京，红卫兵小报也为数甚少，况且，1966 年 10 月前后的红卫兵小报，还主要掌握控制在首都一司为代表的红卫兵手里，不是后来三司那样的造反派主流。因此恐怕是王力记忆有误。笔者推断，毛泽东“天天看红卫兵小报”的时间，恐怕再早也在 1966 年 11 月、12 月那个时期内。

由此可见，起码在 1966 年年底以前，毛泽东对红卫兵、造反派小报，就已经高度关注，并且给予了某种肯定和好评。

毛泽东这种态度，肯定又反过来给予在其身边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施以影响。从这个背景看，《人民日报》发布那个《启事》，就不足为怪了。

以《人民日报》当时在国人（尤其在造反派）心中的权威地位，这则《启事》所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

《红旗》杂志也加入征集“小报”行列

《人民日报》征集造反派小报的《启事》在全国红卫兵造反派中间掀起的热潮尚未平息，在中国人心目中同样视为“代表中央声音”的又一权威性机构，也不甘落后地加入了公开向造反派征集小报的行列，这就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

1969年2月6日，《人民日报》第2版同样在左下角，以“红旗杂志社”的名义，刊出一则性质几乎一样的《启事》：

启 事

为了更好地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本刊征集全国革命造反派办的报纸，望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大力协助，把你们办的报纸每期寄五份到红旗杂志社来。

红旗杂志社

比较起来，这则《红旗》杂志社的《启事》，与1月29日和1月31日《人民日报》的《启事》，从内容到措词，几乎一模一样，甚至可以说，后者就是前者的翻版，只不过将征集的小报份数，从每期10份改为每期5份。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两家代表党中央的特殊机构，连续发出《启事》，公开向全国造反派征集小报，这种举动的政治分量是很足的，它给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以及全国、全党、全军传递的信息不言而喻。也就是明确告诉人们，造反派们这种自办的小报的举动不仅合法，而且值得重视和提倡，因为它宣传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代表中央的（包括前文提到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三个权威性机构，接连在报上刊登“启事”或张贴“公告”征集造反派小报，这番举措在社会上的影响，确实大大提高了红卫兵造反派小报的政治身价，以及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其直接后果就是：第一，不管是北京、上海等文革风暴的中心城市，还是各省市自治区，以及相隔万里之遥的边远地县，各种小报如雪片飞向这三个机构，以至数量之多令工作人员忙不过来，难以逐一清理登记和挑选；第二，各地尚未办有小报的红

卫兵、造反派组织，纷起效尤，不管条件具备不具备，也要利用一切可能，抓紧一切机会，加入到这个几乎是“全民办报”的“大合唱”中。

文革小报真正迎来了其发展兴盛的“黄金时期”。

清华《井冈山》和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政治野心

据估计，仅 1967 年创刊的小报，就达数千种之多。不过，就某个省市或某个地区而言，无论大中学生办的真正意义上的红卫兵小报，还是其他组织办的造反派小报，也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

所谓“主流小报”，就是指在某个省市或地区，由处于某种主导支配地位，对局势走向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组织所创办，能在当地社会舆论方面（甚至突破地域限制扩展至外地）有较大影响的某种或几种报纸。除此之外，都算是“非主流小报”。

比如说，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所控制的几份小报，清华《井冈山》、北大《新北大》，北航《红旗》、北地《东方红报》、北师大《井冈山》，以及“首都三司”所办的《首都红卫兵》，这些小报，不仅在北京，就在全中国而言，也堪称“主流小报”。其他，如上海的《红卫战报》、《上海红卫兵》，以及上海“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派》，黑龙江哈尔滨的《红色造反派》（有毛泽东侄子毛远新撑腰）。在四川，成都地区是《八·二六炮声》与《兵团战报》，重庆地区则是《山城战报》和《8·15 战报》等。这些小报在当时的影响，都超出了市界、省界，一度扩展到外省市以至全国。

不过，这些所谓“主流小报”中，影响最大，知名度最高，而且最怀有政治野心者，当数清华《井冈山》及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这两份报纸，一份是红卫兵小报的代表，一份是造反派小报的代表。其背后的实权人物，一位是“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另一位则是“文革工人领袖”王洪文。而且，两人的共同点是，当年分别得到江青及毛泽东的赏识，所以一度风光无限。

在首都文革小报中，清华大学《井冈山》创刊不算早，1966 年 12 月 1 日才创刊，不仅晚于众多首都大专院校，也晚于好些省市红卫兵小报。原因在于蒯大富一手控制的“井冈山兵团”正式成立较晚。至 1966 年 12 月下旬，《井冈山》小报仅出刊 4 期。首创之初，大致维持在每周一期的周报水平。不过，由于蒯大

富深得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是江青本人赏识和信任，在北京的众多高校红卫兵造反派头头中，很快就处于一种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特别是经江青授意，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南海西门召见蒯大富面授机宜，蒯大富随之带领清华井冈山兵团等造反学生 5000 之众，搞了那次在全国率先公开打倒刘邓大示威的“12·25”大行动之后，中央文革江青等人对蒯大富及其掌控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就更加另眼相看。蒯大富在首都高校红卫兵中的“领袖”地位，以及对全国红卫兵运动和文革局势的影响，也更加显赫和确立。

清华《井冈山》小报，也就成了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头头们推行其政治意图，实现其政治野心的重要工具。由此，创刊虽晚于其他首都红卫兵小报的清华《井冈山》，在进入 1967 年年初之际，很快以一种非常的方式急剧发展和对外扩张（向北京之外的外省市）。

1967 年初，清华《井冈山》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争取成为全国红卫兵小报中的“龙头老大”。首先，在内容方面，接连出了几期带有“重磅炸弹”性质的小报及“专刊”、“增刊”，以制造轰动效应，扩大影响。同时在公众心目中抬高身价。具体表现在：

1966 年 12 月 31 日，《井冈山》以“专刊”的形式，以 4 个版篇幅，全文刊载刘少奇女儿刘涛（时在清华大学读书，文革初期曾任清华“校文革”负责人）的“检查”：《造刘少奇的反，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1 月 1 日，《井冈山》第 5 期发表《向刘邓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记井冈山兵团 12 月 25 日大行动》的文章，全面记述 1966 年 12 月 25 日蒯大富等带清华井冈山兵团 5000 多人在天安门召开“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以及在北京街头示威游行情况（该份《井冈山》报及其文章，后来成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时出示的证据之一）。

1 月 8 日，《井冈山》第 8 期以第 1 版头条醒目位置，发表编辑部文章《清华园内春来早》，吹捧江青等人 12 月 30 日的“清华之行”。

1 月 26 日，《井冈山》以“增刊”形式，并配以多幅照片，全面报道以卡博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在康生陪同下访问清华大学，并与清华井冈山战士开座谈会，以及参观“清华大学两条路线斗争图片展览”的情况。

清华《井冈山》报这一连串的动作，确实大出了风头，其风头甚至盖过了“首都三司”的机关报《首都红卫兵》。

在出刊发行这个关键环节上，清华《井冈山》也显示出后来居上的不同寻常之处。最引人瞩目者，有三大措施：

第一，在小报的印数上，由于有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强大“后台”，其小报的用纸及经费，能得到充足保障。因之，到1966年底1967年初，才创刊一个月，出刊仅几期的清华《井冈山》，印数直线上升到50多万份。令一般红卫兵小报望尘莫及。

第二，实现通过邮局正式发行和订阅。

红卫兵小报系民办报刊，只能自办发行，但清华《井冈山》创刊一个多月后，就在努力争取能如官方正式报刊一样，通过邮局正式征订发行。1967年1月9日，便以“井冈山报社”（这种自封“报社”的举措也颇能显示其政治野心）的名义，对外发布“启事”称，“本报将于六七年二月份起由邮局负责发行，凡北京读者皆可到本市邮局办理订阅手续。每月出版6期，订价一角二分。邮局现已开始办理”，“外地革命群众可径向当地清华大学联络站联系订阅”。

第三，发行“航空版”，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代印点。

印“航空版”本是解决少数几份中央级报纸在外省市的印刷发行和及时收看问题的办法。当时，仅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重要报纸享有“航空版”待遇。文革动乱高潮之际，为保证这些中央报纸“航空版”的正常运行，中共中央还于1967年1月3日专门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正常印刷和发行”。

不知蒯大富等头头当时动用了些什么关系和手段，终于如愿以偿，在国内少数省会城市发行“航空版”，将清华《井冈山》提升到了发行“航空版”的档次。这对蒯大富以及清华《井冈山》来讲，都是值得展示的一种荣耀。因此，在开始发行航空版时，特在《井冈山》小报上，大张旗鼓刊出了一份《致读者》的“公布”，让天下造反派和公众皆知。在笔者所存的一份1967年1月1日出刊的《井冈山》第6、7期合刊选登的第一版右下角醒目位置，刊登有一则《致读者》：

为了全国革命造反派组织能更好地大联合、大团结，交流革命经验，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我兵团《井冈山》报决定向全国发行，在成都设立航空版代印处，向全省发行，希望广大革命同志大力协助，并监督我报办得更好，热烈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批评建议。

落款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成都联络站”和“《井冈山》报成都编印组”。而所署日期则是“1967、1、23”（此报实际是1月下旬在成都出刊的《井冈山》的“再版报”，所以日期与刊头所注日期有异。关于“再版报”，本书有专章论及）。

上文所讲的1月11日出刊的《井冈山》第9、10期合刊，第4版上刊登的《本报启事》，其中在谈及“本报从六七年二月份起由邮局负责发行”外，还特别通告说：“另外，上海、广州、杭州、西安等地还将设立航空版代印点。”也就是说，除成都外，清华《井冈山》将在上海、广州、西安等国内主要大中城市发行“航空版”。清华《井冈山》从“邮局负责发行”，到设立“航空代印点”，说明其已经开始露出从“小报”往正式发行的“大报”靠拢和过渡的“野心”。

“航空版”的问世，确实让清华《井冈山》大大地风光了一回，由此，基本确立了在全国红卫兵、造反派小报中的“老大”地位。

另一份从创办起就显露出明确野心的小报，是上海“工总司”作为“机关报”的《工人造反报》。“工总司”在上海一家独大，因为有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背后的中央文革小组作后台，其政治野心日渐强烈和显露。政治意图和指向，不仅要“上海第一”，也要“全国第一”。《工人造反报》也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不同寻常之处。

《工人造反报》创刊于1966年12月28日，如清华《井冈山》一样，也是属于创刊稍晚但后来居上的主流小报。与清华《井冈山》不同的是，《工人造反报》为显示其出手不凡，从创刊起，就以对开大报的格局雄居上海滩（当时上海各家小报，除《红卫战报》、《上海红卫兵》是对开大报外，其余皆为4开小报）。创刊之初，大致每周一刊，一个月出报4期。其发行开始也是由自己零星散发与销售，每期报头处，注有“本期四版，另售三分”字样，属于自办发行性质。

但到了 1967 年 2 月下旬，《工人造反报》从第 11 期起，改为交邮电部门发行。其 2 月 23 日出刊的第 9 期，于第 4 版右下角刊登一则《本报启事》：

本报启事

为了适应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需要，为了满足广大革命造反派同志的要求，根据广大读者意见，本报自第 11 期起交邮电部门发行，在本市接受集体订户并办理零售。

本报每期出版一大张（对开四版），订阅、零售定价均为三分（出版六版时售价为五分），暂不定期出版。订阅办法如下：

经与邮电部门商定，本市读者一律向所在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登记付款。各革命组织凭介绍信向邻近邮电支局办理订阅手续。

由于本报出版日期不固定，收订暂按期计算。目前先收订十五期（即第 11 期至 25 期），计人民币四角五分，收订自即日起至二月底。逾期仍可自第 12 期或以后的期数起订。

本报将要出版的第 9、10 两期委托邮电部门代销。

为了把本报办成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希望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大力支持，来信来稿请寄“上海邮政信箱第 317 号”。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造反报》编辑部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

也就是说，仅仅出刊 8 期之后（该《启事》称，第 9、10 期也交由邮局代销），《工人造反报》就如同官方媒体《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一样，引人瞩目地取得了邮局发行权。这也是王洪文等“工总司”头头试图让《工人造反报》逐渐往

官方大报靠拢过渡的重要举措之一。自此直到 1970 年代初期停刊为止，王洪文控制的这份《工人造反报》都是通过邮局征订发行。

不过，与蒯大富控制的清华《井冈山》稍有不同的是，《工人造反报》不过分张扬，也不急于寻求往外省市扩张搞“航空版”、设代印点之类，似乎只专心经营上海这块地盘。而且，在报纸所刊内容及风格方面，《工人造反报》也显示出与一般的红卫兵、造反派小报动辄大喊大叫的“造反风格”似有所区别，即保持一种相对平缓稳重的面貌，避免过分偏激，似乎在刻意追求往正统报纸风格靠拢的媒体形象，尤其到《工人造反报》的中后期愈加突出。其风格内容，若隐去报头报名，乍看之下，还以为是一种官方报纸。其实，这正是王洪文等“工总司”头头比蒯大富这类红卫兵头头高明之处。他们夺权掌权之后即全力靠近当局，并努力维护树立正统秩序和形象。这一点确实博得了中央高层（包括毛泽东本人）的好感和赏识。其结果，不仅王洪文一度被视作“接班人”培养，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高位，而且，《工人造反报》在数千种造反小报中，寿命最长，一直出刊到 1970 年代，发行数百期之多。而作为“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之首的蒯大富，夺了权之后，却一味“造反”“革命”，只知道冲冲杀杀，结果仅仅“红”了一年多时间便被当局抛弃。清华《井冈山》报也昙花一现，其最终结局，根本不能与《工人造反报》一比。

被小报左右的舆论

从时间段看，1967 年 1 月“夺权风暴”之后的 2、3 月份开始，文革小报就渐成气候，到 5、6 月份，小报似乎达到登峰造极的高潮期。此后一直到当年秋冬之际，这半年左右的时期，才真正是整个文革小报发展的全盛期，或者可称作“黄金时期”中的“黄金时段”。

这个时期的特点，可以用“春秋战国”来形容，即随着各种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之间的争争斗斗和分分合合，形形色色的小报，犹如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小国一样，也不断地在历史舞台上变幻进退，生生灭灭。同时确实也呈现一种短暂的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繁荣纷乱境况。

也正由于此，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时段，从当时各省市（甚至也包括首都北京）的社会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小报所左右。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当时主流舆论的缺失，文革小报乘虚而入，占领其留下的“真空”，并控制了相当部分社会舆论；其二，夺权造成的冲击，让各地及各级政权机构出现混乱，权力也出现“真空”。红卫兵造反派因中央（或者说中央文革）的强力支持，仍然处于主流地位，仍然控制着相当大的话语权，这样，当时的社会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小报左右，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关于 1967 年夏秋之间那段特殊时期，一个省市，或者一个地区的社会舆论基本上被小报所左右的事例，最典型的，要数成都“五·六”事件，以及上海的“上柴联司”事件，在这两个著名事件中，小报确实将整个社会舆论影响、左右了，形成了“一边倒”的舆论倾向。

1967 年 5 月 6 日，位于成都黄田坝（文革时改名为“红旗坝”）的大型军工企业 132 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冲突。当天，数万造反派围攻 132 厂，处于劣势的该厂产业军“红联”人员，怕遭到两天前川棉一厂产业军数幢大楼被造反派攻下而全军覆没的结局，在驻厂军代表及厂领导同意下，发枪后开枪自卫，上百支冲锋枪、步枪、手枪一起开火（132 厂为造飞机的国防厂，平时储有武器），造成当场死亡数十人，伤上千人的特大惨案。这就是著名的成都“五·六”事件，又称“132 厂大惨案”。消息传开，全国震动，中央亦深感震惊，并迅速作出反应。当晚，中央高层紧急命令成都军区派野战部队进驻并接管该厂，搜捕“红联”武装人员。第二天，5 月 7 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出台，该《决定》共有 10 条内容，故被四川造反派称为《红十条》，其中第 10 条即专谈成都“五·六”事件。措词虽较客观，但实际也是对开枪者的政治打击。

如此严重的伤亡，这在建国以来，不仅在成都，而且在四川，也是首次，自然引起整个社会的强烈关注。而此时，夺权后的《四川日报》，正处在只登载新华社电讯的《红色电讯》时期，成都市惟一的报纸《成都晚报》，也被改为类似的《红色新闻》。官方正统舆论的缺失，给小报留下极大的空间。此时的成都小报完全是一边倒，“产业军”及其支持者连出面为自己辩护也无可能。由此，接连几个月，整个成都地区及四川全省，关于“五·六”事件的报道记述，刊于各类红卫兵造反派小报，100%是攻击指责“产业军”，而不去分析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各路造反派数万人蜂拥围攻 132 厂，而造反派的根本意图，是试图一举拿下

这个“产业军”在成都的最后“堡垒”。当时小报的宣传报道引起全体市民对“产业军”的不满和痛恨，“产业军”及其支持者从此在成都再无立身之地，不久之后便全面垮台。

类似情况，还有发生在上海的“上柴联司”及“支联站”事件。

“上柴联司”，全称是“上海柴油机厂工人联合造反司令部”，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中的“反对派”，或者说是上海造反派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月革命”夺权阶段开始，“上柴联司”与王洪文一手控制的“工总司”公开对立。1月24日，王洪文组织“工总司”1万多人，准备袭击“上柴联司”，将其彻底砸掉。因“联司”早有准备，未能得手。但“工总司”人马也抓走了200余名“联司”成员，将其送往上海市公安局关押。“联司”组织成员及支持者到市公安局请愿，并呼吁全市人民支持其行动。由此，“联司”不仅稳住了阵脚，而且声势越来越大。3月以后，上海全市不少单位出现了支持“联司”的团队，并在此基础上横向联合，成立了全市性组织“上海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联司联络总站”（简称“支联站”）。

“上柴联司”及“支联站”，就此成为了与上海“工总司”对立的重要派别，其存在及活动，不仅直接威胁到王洪文控制的“工总司”，而且也威胁到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在张春桥默许下，8月4日当天，王洪文着手实施他亲自制定的行动方案，开始了代号为“888”的围剿攻击行动。他调集10多万工人，数百辆卡车，几十台消防车，带着“文攻武卫”牌子，围打在上海柴油机厂据守的“上柴联司”。并动用近10艘舰船封锁黄浦江，堵住“联司”退路。武斗共造成18人死亡，近千人受伤，另有600多人被关押的严重后果。成为上海文革规模最大，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武斗。

按理说，“8·4”事件中，“上柴联司”及“支联站”是受害者，但在张春桥、王洪文控制下的上海，当时铺天盖地的却是支持声援“8·4”武斗事件的挑起者上海“工总司”，以及声讨“上柴联司”及“支联站”所谓“罪行”的舆论。尤其是以《工人造反报》为首的上海各造反派小报，以及《上海红卫兵》为代表的红卫兵报纸，都是一边倒地声讨攻击“联司”及支持者的文章、照片和有关消

息报道。可以说，上海（包括周边的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当时的整个社会舆论，完全被左右了。

节录自作者书稿《中国文革小报研究》第二、三章。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史林一叶】

中国科大的“雄师”和“井冈山”

忻鼎亮

在以往文革回忆的资料中，每谈到1966年“十二月黑风”，多数人都认为是指“联动”发起的炮打“中央文革”的一系列事件，其实这一说法是不完整的。大约在那年11月，起初追随中央文革的造反派中已有一部分人对这个“救世主”产生了不满，私下里议论不断：“中央文革比那些老干部还要跋扈”、“哪里是什么群众运动，分明是运动群众”。在地院、北大、清华、科大的造反派大学生中都能听到这类的批评声，其代表是地院的朱成昭和科大的“雄师”。朱成昭是当时的首都三司的司令，名声、地位都比较显赫，但他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精神，不肯随波逐流。他在地院东方红两个核心战斗队（“高旗无畏”、“八八”）小型会议中，多次批评中央文革（因笔者对这些情况了解不够，不能进一步详细述谈）。

科大“雄师”是当时科大一些不满中央文革言行的大学师生组织起的一个小型战斗队，人数大约有三十几个，比较集中在6431（近代化学系化物专业大二）、6443（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大二）这两个班级。其核心人物有朱栋培（当时叫朱军）、周平（6431）、冯正永（6443），朱是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有思想，在学生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创办的油印刊物《孙悟空》强调运动中的大民主，认为对领袖人物的批评不应该是无条件的；周平是科大较有名的学生造反派，在运动初期，曾孤身冲上台去打断党委书记刘达所作的动员报告，其后又造工作组的反；冯正永是该班的学生干部，在工作组期间，曾受过不公正迫害。周、冯二人在科大广大师生中均有良好的口碑。在他二人的影响下，这两个班的一些同学高玉敏、王芸莉和许大正、姜作勤等都参加了“雄师”。

该战斗队成立于 1966 年 12 月 30 日，成立后的 1967 年元旦，就贴出首篇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不但贴在校内，而且贴到北京西单闹市区。文章中直接批评陈伯达《两个月运动的总结》是“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并矛头直指中央文革：“两个月来的北京运动，随着中央文革的错误发展，越来越远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当时他们确实有种“慨当以慷”的心态，周平称这是：“过了个革命化的新年”。大字报贴出后，有相当的反响，毕竟“雄师”说理式的批评有别于标语口号式的发泄，给对中央文革不满者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撑。于是，支持者和反对者都络绎不绝地来到科大，或是求教或是声讨。在 1 月 3 日，他们又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分歧在哪里？》，语气更趋缓和，但立场仍毫无改变：“中央文革有时突出毛泽东思想不够”、“群众对大量的首长讲话越来越感到不知所措”、“我们希望中央文革采取必要措施，挽回由于镇压反革命扩大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当然，为了躲避整肃，他们强调这是善意的批评，为了进一步促进文化革命运动深入发展，但这类书生气的辩解在政治斗争中毫无用处。1 月 11 日，他们的总部和住处均被查抄，但他们并未屈服，周平当即提出绝食抗议，同时，他们也做好了被抓的准备，并选出了第二套负责人班子。1 月 15 日凌晨，他们中五个重点人物（朱军、周平、冯正永、江晓东、黄晓光）便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被抓进北京公安局。在警车带走他们五人时，科大不少学生居然自发出动，拦截警车，指责抓人者“破坏大民主”、“违反十六条”。当然，这些行为实际上同样于事无补，拦车者既不能阻止抓人行动，反而留下了事后一次又一次检查的内容。但是在思想上，至少给科大师生留下了很值得回忆反思的一幕：文革时的大学生们并不都是头脑发胀、追名逐利、起哄胡闹，不少人并不屈从于权势，而在认真地独立思考，他们当年的言行是经得住自己良心拷问的。

在“雄师”被摧毁后，科大又出现一个叫“井冈山”的组织，人数也只有十来个人，其主要成员有：刘祖平（近代物理系）、陈玉龙、倪诗茂（力学系）、赵婉如（无线电系）、陆宗伟（化学系）、肖杰（数学系）等。他们在思想上与“雄师”接近，很反感抓“雄师”的行为，当然在策略上他们再也不能公开向中央文革“叫板”，其大字报形式上是批评当时科大掌权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的一些专横、不理性的言行，在实质内容上反复强调权力机构的民主建制，隐晦地表

示出对文革引导者收回“学生自己解放自己”承诺的异议。毫无疑问，这样的组织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同样很快被取缔，陈玉龙也以“反动学生”名义被抓。直到后来，“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教训学生的运动中，当年“雄师”、“井冈山”的主要成员几乎无一漏网地被不同程度地整肃。

科大文革的这段历史从未见人提起，当然，因为它时间短，影响小而被忽略。但我觉得它不应被忘记的理由是：这毕竟是背离文革主旋律的民间自发的一种思想倾向，它一方面是当年年轻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和民主的本能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对争名图利、趋炎附势的逆向行动。笔者既不是“雄师”成员，也不是“井冈山”成员（他们中间有我许多好朋友），但这一小段历史却使我长久萦怀，觉得应该晓以后人。我的这些朋友们现在大都在自己的专业上成就卓著，他们从不像有些人那样，喜欢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更不以此为资本抬高自己的社会身价，但这些都让人深度思考着做人的良知。

在结尾时再顺便说两个小故事。

1、在1978年，我考入科大“物理教师进修班”，遇见了周平（她和我同期考入）。故友相逢，正欲叙旧，她说的第一句话是：“鼎亮，我在一打三反中曾揭发过你，向你道歉！”我当时十分感动，我知道，一打三反时，我和她同为“反动学生”，都一样失去自由。那时揭发过我的人至少数以百计，事后向我当面道歉的则极少，更何况，我根本无法知道，究竟谁揭发过我，她如果不说，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但她追求的是真诚的良心洗涤，我真想不到，成年人还有这样纯真的心。

2、去年，科大成立五十周年校庆，在校友代表座谈会上，大家讨论科大精神，科大校风时，许多代表都强调了科大人追求攀登科学高峰的专研精神。我却借文革话题说了一段不太合时宜的话：“在文革前，科大是与清华、北大齐名的全国三大名校，但在文革中五大学生领袖不包含科大，我认为这是科大的光荣，说明科大学生不张扬，勤思考。”那时，我嘴里没说，心里却想起了“雄师”和“井冈山”。

当然，我的回忆毕竟不是亲身经历，只能作为引玉之砖，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完整地补全这段不应遗忘的文革史。

关锋与郭冲

王广宇

郭冲是原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他于 1960 年从部队的高等学校调到政研室工作后，我们一直在一起共事，搞调查、编书都在一个组。后来，政研室内部机构变化，新成立了“经典著作组”，他任组长，从此，我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1964 年秋，中央政治研究室扩大，改称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郭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组的召集人（当时中层干部都没任命，各组负责人一律称召集人），仍然是我的顶头上司，因此我们相互比较了解。

1964 年秋，马列主义研究院。《红旗》杂志社混编到北京市通县宋庄公社的高各庄大队和翟里大队搞“四清”，郭冲带领的国际共运组的十多名新来的大学生分到翟里大队，他任翟里工作队的队委兼第四生产队的工作组长。翟里大队工作组成员大部分是《红旗》杂志社的工作人员，马列主义研究院只有国际共运组全组和其他组的个别人员分到翟里“四清”。我被分到翟里第一生产队工作组，在关锋领导下参加“四清”工作。

在“四清”中，关锋和郭冲都是工作队委兼组长，相互之间有些了解。关锋很欣赏郭冲那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敬业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文化大革命开始，关锋一跃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组建中央文革办事机构时，关锋推荐郭冲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

因为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兼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央文革各办事机构，先后从马列主义研究院调进了三十多名工作人员。调到中央文革工作的大部分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研究生，只调入三名十七级以上干部作为骨干。郭冲就是这三人中的一位。

郭冲是在文化革命初期调入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当时，北京市各高校正在“乱”。1966 年的秋天，北京各高等学校的造反派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文化革命运动发生了转折，工作组和派工作组的中央领导人，一夜之间变成了镇压革命造反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推行者。清华大学学生造反派蒯大富从禁闭室放出来

以后，造反派在他指挥下成了造反动路线反的先锋。在文化大革命中，较早地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的当属清华大学，因为王光美就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

在那种来势凶猛极端激烈的斗争中，在形势的压力下，正在清华读书的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表示要同刘少奇划清界限，在清华园校园内贴出了揭发刘少奇的大字报。这个爆炸性新闻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就在刘涛贴出刘少奇大字报的那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正在钓鱼台十六楼开会，在开会中间，中央文革小组突然布置办公室紧急动员去清华大学抄写刘涛的大字报，因办公室工作人员都在忙，决定从马列主义研究院临时抽调一批人马上进清华园抄大字报。我奉命前去马列主义研究院紧急组织人马，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党委专职书记赵易亚的配合下，很快从研究院调集三十多名人员（主要是年轻大学生）集合乘研究院的汽车进入清华园。当时确定抄大字报的原则是，除了刘少奇的大字报外，其他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新政治局常委被点名的也一并抄来。抄大字报的队伍进入清华大学后，发现清华园内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各高校的学生和群众蜂拥来看大字报。我们这支抄大字报的队伍，分散在人群中，集中精力抄写有关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刚刚抄了一会儿，突然清华大学造反派的高音大喇叭发出“通令”，禁止观众抄写字报，同时派出了清华造反派学生到校园现场检查，发现有抄大字报的人当场没收，还封锁了校园，禁止出入。我们这支抄大字报的队伍虽受中央文革的指派，但也不能暴露身份，只好收起纸笔，佯装观众，陆续撤出清华园。那天晚上抄下来几十张残缺不全的大字报，交给中央文革小组后，没有什么反映。

后来我听说，那天晚上清华园内禁止抄大字报，封锁校园的命令的幕后指挥者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位副组长，何其滑稽，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文化革命一开始，中央文革内部的明争暗斗就在微妙中开始了。

清华大学抄大字报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感到信息不灵通，会造成被动，于是决定向北京主要高等学校派遣常驻记者组，随时掌握高校文化大革命的动向。同时决定建立中央文革记者站，向各省市自治区派遣常驻的中央文革记者。最早在北京高等学校设立常驻记者组的只有三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从马列主义研究院参加清华大学抄写大字报的人员中，选调了一部分人到中央文革充当记者。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郭冲和王正萍分别被中央文革小组任命为

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记者组组长，每个组有三、四名记者，常驻这两个学校，每天向中央文革记者站发送消息和运动动态，刊登在中央文革内部刊物——《文化革命简报》和《快报》上，其他高等学校则由记者站随时派记者采访。

郭冲和王正萍都是关锋提名，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作了政治审查才调进中央文革记者站的。郭冲是国际共运组的，王正萍是哲学组的，二人并未在一起共过事，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后又分别在不同的学校当记者，按理说不应有什么瓜葛和芥蒂。王正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就当上了马列主义研究院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或副主任），他调到中央文革前，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部分群众对他工作有些意见，调到中央文革当记者后，群众意见更大了，于是就在马列主义研究院院内给王正萍贴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还涉及到王正萍的历史问题。这个情况，关锋很快便知道了，他听信了马列主义研究院有关人员的反映，说研究院反对王正萍、贴他的大字报的这些人得到了郭冲的支持，还说因为郭冲的爱人在马列主义研究院人事处工作，了解王正萍的历史，大字报中关于王正萍历史上的问题可能就是她透露出去的。关锋大为恼火，因为在关锋眼中，王正萍是坚定的“左派”，即使工作上有缺点，也不该用大字报的方法攻击王正萍。

于是关锋迫不及待地找郭冲谈话，让他去做反对王正萍那些人的工作，制止研究院部分群众贴王正萍的大字报。郭冲说，他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后，工作很忙，很少和研究院的人接触，不了解贴大字报的情况，他表示由他出面压制群众贴大字报不合适，人家也不会听。关锋说他是反王正萍的后台，郭冲坚决否认。谈话不欢而散。关锋固执地认为，郭冲不愿出面制止群众贴王正萍的大字报，正是他支持部分人反王正萍的表现，认定郭冲就是后台。

与此同时，关锋让我向调到中央文革办公室和记者站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人员打招呼：不要介入马列主义研究院的运动，即不准回马列主义研究院贴大字报。1966年初秋，关锋生病，在钓鱼台十五楼，我去看关锋，关锋的家属也在场，其中一人就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又议论起马列主义研究院的运动，说研究院有一股反王正萍的势力，关锋躺在床上说，郭冲是不是反王正萍的后台？我说我一直没回过研究室不了解情况。我告诉他，关于他对研究院调到中央文革的人“不要介入研究院的运动”的指示，已经传达下去了。正在这时，陈伯达也来看关锋，关锋借机对陈伯达说：“他们（指看护他的亲属）正在议论马列

主义研究院的运动，你们可以向伯达同志谈谈情况嘛！”陈伯达当即不耐烦地摆手说：“我不要听，我不听！”陈伯达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院长，不愿听研究院运动的情况汇报，不知为哪般？

郭冲没有答应出面制止研究院的一部分人反对王正萍，关锋耿耿于怀。有一天晚上，关锋让郭冲再次来钓鱼台谈研究院反王正萍的情况。关锋在钓鱼台十六楼大厅同郭冲谈话，继续要郭冲出面制止群众贴王正萍大字报。郭冲辩解说，我不了解情况，无法出面制止。关锋气得暴跳如雷，大吵大喊地说：“你郭冲打击左派！这是什么立场”“就是你背后煽动的反对王正萍！”郭冲继续辩解，不肯就范。这时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间到了，关锋要去开会，他叫我继续同郭冲谈谈，让他出面平息研究院反王正萍的风波。我无奈只好听命。我劝郭冲承认点错误，向关锋作一点违心的检讨吧！可以表示向群众做点工作，总得做点表示。郭冲对我说：反王正萍的事，我确实不了解情况，群众对他有意见，我怎么能去给泼冷水？我去找谁做这个工作？我说服不了郭冲，谈话又不了了之。后来关锋是不是又对郭冲施加过压力，我就不了解了。

大约是1966年末，王正萍被调回马列研究院，不再担任中央文革记者站驻北师大记者组长。郭冲继续任驻清华大学记者组长。在这之后的一个晚上，王力和关锋到记者站开会，叫我随同，这个会主要是调整中央文革记者站驻北京各高等学校的记者配置，缩小北大、清华、北师大的记者组，加强北京其它高等学校的记者力量，实际上是撤销北大、清华、北师大记者组。在这个会上主要是王力讲对各记者组进行调整的原因，认为这几个重点高校的运动趋于稳定，要加强其它高校运动情况的了解等等。会上，有一位从研究院调来的年轻记者向王力反映：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造反派受到了压制和打击，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去过问一下。王力说：我们这个会不讨论这个问题。在最后重新分配记者时，王力宣布：清华大学记者组撤销，只留下郭冲一个人作为清华大学记者。当场，郭冲站起来提出意见，他说：清华大学这样一个大学校，只留下我一个人，我干不了。再说，我写报导慢，没有一个人协助，影响了工作我负不起责任。王力说，不是各高校都减了人吗？你一个人怎么不行？郭冲说，我的情况，王广宇都了解，不信，你问王广宇。王力看着我等我回答，我说，“郭冲一个人留在清华是有些困难，是否给他配个助手？”王力答应了这个要求。会上，关锋没有讲什么话。郭冲继续带一

个记者留在清华。

郭冲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懈怠，即使如此，他仍担心出差错或误了事。他在清华当记者初期，主要是1966年末至于1967年初，发给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的稿子都先寄给我，让我先看看，能不能发，不适合发就扣下，能发就转记者站。我理解郭冲的难处，虽然记者写稿直接先寄给我叫我再转记者站这是唯一的例外，我不能不帮这个忙，这样，他可能心里踏实一点。

王力主管记者站的工作，关锋只协助他管，在研究记者站的工作时，一般情况下，王力都要我和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参加。有一个阶段，关锋对清华大学反映的情况不满意，他多次在研究记者站工作时说：“郭冲这个人不行，重要的情况反映不上来。”“让他回马列主义研究院算了。”每当这时，王力都不明确表态，他往往看我和徐学增的态度，我们俩如果不表态，王力就继续用郭冲。在研究记者站工作时，关锋至少提出两次要郭冲回马列主义研究院，因为我和徐学增没有表态，王力没有采纳关锋的意见。与此同时，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党委书记，院文革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赵易亚曾两次打电话给我，说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革命群众对郭冲有些意见，希望郭冲回研究院听听群众意见，参加一段运动。我都以清华大学记者工作很忙，郭冲脱不开身，以后再说，我的话搪塞过去，我说的也是实话。

对关锋和赵易亚等人要把郭冲调回研究院一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翟里“四清”中和郭冲共过事的戚本禹私下里向我表示过他不赞成关锋对郭冲的态度。戚说，郭冲是你关锋提名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的，即使郭冲有什么错误，也不应该对他那样的态度，坚持要把郭冲调回研究院，这事若是我不会那样处理，郭冲是个老实人嘛！戚本禹和关锋关系不错，连他都对关锋的做法不赞成。这样，把郭冲调回研究院一事，王力不积极，戚本禹不赞成，于是就搁置下来。

1967年的5、6月，有一天，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向办事组要一个清华大学的材料，我给记者站打电话找郭冲要这个情况，可记者站接电话的记者告诉我，郭冲已被调回研究院。接电话的同志也是马列主义研究院调来的，我忘了是谁，他说已经回去一段时间了。

把郭冲调回研究院没有经过办事组，这是不正常的。我心里明白个中的奥妙，也不便多问。8月末，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赵易亚也同时被打倒，在批判会上提到他同关锋迫害郭冲时，有人问赵易亚，郭冲是谁要回研究院的？赵易亚当

场回答：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王广宇打电话让郭冲回来的。我当场质问赵易亚，我什么时候给你打过让郭冲回研究院的电话？赵易亚又说记不清了，反正是中央文革的电话通知。

关锋在马列主义研究院没有职务，他自己违背了“不介入”研究院运动的指示，对郭冲的做法，我觉得有失公正，实在不应该。

【口述历史】

文革与个人恩怨 ——茅家琦教授访谈（节录）

时间：2006年2月27日

访谈对象：茅家琦

访谈者：董国强等

地点：茅家琦家

[茅家琦：南京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曾经担任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文革爆发时是南大历史系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

董国强：茅老师，您在文革一开始就受到点名批判。我们希望更多地了解您在文革中的遭遇，以及您作为一个资深历史学家现在对文革的看法。

茅家琦：好的。要说起来，我第一次受到批判不是在文革期间，而是在1958年。

我是1947年进入中央大学经济系学习的。1949年南京解放，中央大学先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后来去掉“国立”两个字，就叫“南京大学”。我1951年从南京大学毕业，然后就一直在学校工作。

1951年毕业以后，领导上就把我留在学校做政治工作，具体的任务是到图书

馆去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当时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我在图书馆搞得不错，没有什么“左”的问题，没有殴打，也没有“逼供信”。所以领导上对我特别信任。第二年（1953年）调入教务处工作。

但是我一直想搞学问，想教书。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我从1953年开始兼任“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在当时教这门课的几个老师里面，学生们对我反应是很好的。于是我就向领导上请求离开教务处，专门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但是有些领导不同意。幸好当时有两个人支持我，一个是孙叔平，一个是陈毅人。孙是副校长，陈是党委书记。特别是陈毅人，是他将我调到历史系。

1956年调到历史系以后，我就开始看书学习，做一些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发展也比较顺利，我担任了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不过我这个总支副书记也是管教学的，不管政治。这个就联系到后来我第一次被批判。当时批判我什么呢？就说我是“不问政治”，当时叫“走白专道路”。所以对我的第一次批判是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我记得第一次在大礼堂全校干部大会上做检查，我在台上做完检查下来，别人上台批判我，说我的检查不深刻。所以我的第一次检查没有通过，后来又检讨了几次才过关的。

我在历史系分管教学和科研工作，我当然希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想了很多办法。当时我们系里有很多老师是研究清朝历史的，陈恭禄教授、王栻教授都是搞清朝历史的，明清史方面的专家洪焕椿教授也搞清史，蒋孟引教授、王绳祖教授他们搞中外关系史，当时也主要搞晚清那一段的中外关系史。所以我们非常有条件研究清史。于是我就把这个情况向郭影秋校长作了汇报，提出我们系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清史研究室”，重点搞清史研究。郭校长支持这个想法。于是我们就成立了“清史研究室”，请洪焕椿教授当这个研究室的负责人，还把系主任办公室腾出来搞“清史资料室”，把学校里相关的书全部都集中在这里。所以清史研究不是中国人民大学最先搞的，而是我们系最先搞的。

另外只要有会，我就请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来给我们的学生上课或者作报告。北京的很多知名学者到南京来，我们都要请他们来系里做报告。翦伯赞教授、吴晗教授他们都到南京大学做过报告。他们到南京来一般都是省委宣传部负责接待的，我们南大历史系也参加接待工作。当时系里出面参加接待的是韩儒林先生，他是系主任。但是很多具体工作是我做的，比如安排住宿，到宾馆接送等等。这

样我就跟翦伯赞教授、吴晗教授接触较多。后来我邀请他们来南大历史系做报告，给我们的学生谈谈历史问题，他们答应了。翦伯赞教授讲的是“让步政策”，吴晗教授讲的什么问题，我现在记不清楚了。

我第二次受到批判是在 1964 年。当时我写了一篇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文章，对戚本禹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李秀成，肯定他在历史上的一些积极作用。这个文章后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有一整版的篇幅。这个文章出来以后，我就受到批判。先是省委宣传部长在全省高校干部会议上点名批评我，然后是《新华日报》两次组织文章批判我。外地报纸究竟有多少家批判我，我就知道了，至少《光明日报》、《文汇报》上都有文章批判我。《南大学报》起码有两篇文章批评我。那个批判是政治批判不是学术批判，都是当作“反动观点”来批判的。这个批判对我而言是非常难受的。

在这个时候我非常感谢匡亚明校长。有一次系里开会批评我，他也来参加了。他来得比较早一些，走到办公室门口碰到我，他轻声地对我说：“你不要紧张，你再写文章。”这个情景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也知道，匡校长讲了话也没用的，我的命运不掌握在他手里，而是掌握在省委手里。但是匡校长避开别人和我讲这些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安慰，起码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对我还是理解的。

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已经非常危险了，我已经是一个“危险人物”了。当然在匡亚明的影响下面，我们学校党委也对我讲了一些好话。我这个人工作方面是不错的，一向勤勤恳恳，对共产党也没什么批评意见。因此对我基本上没做处理。

这件事情对我有没有压力呢？是有压力的。我记得有一次学校里开会的时候，我们的党委副书记讲：“冯定已经被撤销北大副校长的职务。”冯定和我一样，也是 1964 年被批判的。那么他的副校长已经被撤下来了，我说不定也要被撤职的。当时我也在这个会上，党委书记讲这样的话，对我来讲是有压力的。不过后来我没有被撤职。接下来就是到江苏海安农村去搞“四清”。

“四清”回来以后，匡亚明校长要到溧阳去办文科分校。当时南大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绝大部分师生都去了。不过有一些老先生没有去，于是就在鼓楼校区成立一个“文史研究室”。设立这个机构实际上就是对文、史、哲三个系的老先生有一个合适的安置。匡亚明校长叫中文系教授陈瘦竹当这个文史研究室

的主任，叫我当支部书记。这样我就留在学校里没有到溧阳去。

文化大革命一来，首先是溧阳分校的学生们起来贴匡亚明的大字报。很快在溧阳的人都回到南京来搞文化大革命。现在回头看起来，从文革一开始，我就命中注定是要被整的。当时我也有这个思想准备。因为我知道，历次运动一来都是要算“旧账”的，我的“旧账”主要有两笔：第一笔是“白专道路”；第二笔是“叛徒的辩护士”。果然很快就有人贴我的大字报。当时不是一张、两张大字报，而是上百张的大字报，分为几个专题，一个是批判我走“白专道路”，第二个说我是“叛徒的辩护士”，第三个说我是“黑线人物”。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所谓“黑线人物”问题。就是说全国有一条自上而下的“黑线”，当时刘少奇还没有被公开打倒，还没有明确地叫“刘少奇的黑线”，只是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个“黑线”的顶端是教育部，接下来就是南京大学，学校里的“黑线人物”是匡亚明，再接下来就是历史系，系里面的“黑线人物”就是我茅家琦。因为我在系里分管教学工作，教育部的很多措施都是经过匡亚明和我布置下来的。当时把所有的政策措施，凡是加强智育的、加强教学的、加强业务的，全都说成是“修正主义”。例如文革前大学招生主要是招高中毕业生，因为他们年纪轻，高考分数高，都是很有培养前途的。中间“反右”运动以后，1958年曾经强调大学招生要“面向工农兵”。结果招进来的学生成绩很差，所以后来就没有坚持这一条。那么到了文革的时候，“左派”们就说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方面是“修正主义黑线”专政，招的学生都是一些“修正主义的苗子”。

除了教育界有“黑线”，历史学界也有“黑线”，“黑线”的上头是翦伯赞、吴晗他们。那么这条“黑线”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根在哪里？最后就集中在“清史研究室”。“左派”们说，“清史研究室”就是茅家琦在历史系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据点，是一个“黑窝”，“封、资、修”全都在里面。因此我就成为“黑线人物”，被挂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学术路线”上去了。

另外一个罪名就是说我是“修正主义叛徒哲学的吹鼓手和辩护士”。这主要是批判我为“叛徒”李秀成辩护。当时很少提我是“反动学术权威”，我那个时候只有三十几岁，还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除了当时宏观的**政治背景因素之外**，恐怕还与各个单位内部的矛盾有关。而**单位内部的矛盾又夹杂着一些个人恩怨因素**在里面。

第一个，我长期在系里担任领导工作，知道很多情况。韩儒林先生虽然是系主任，但是他基本不管事，系里的行政事务都是我来管的。另外，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在1958年到1966年期间先后换了三个。所以我在这个班子里面算是老的，时间呆的比较久，知道事情比较多。现在看来知道得多是坏事情：你知道得多了，人家就怕你，怕你用很多事情来搞他。其实我这个人是比较宽厚的，涉及到人家的缺点、错误我是不大讲的。政治运动来了，我不一定能保护你，因为我只是一个基层干部，没有决定权。但是我可以不向上面反映你讲了什么错误的话。这样你就可能没事了。但是有些人在一些重要的关头——例如在1957年“鸣放”的时候——讲了什么不合时宜的话，他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他就时刻担心我会向上面反映他的情况，害怕在什么时候我会把他的一些隐私讲出来，所以还是把我的嘴巴封住是最保险的。只有把我打倒了，搞臭了，即使我讲出来也没有人相信，这样他才会感到保险。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第二个，我在工作方面表现不错，所以一直受到领导上的重用。我1956年来历史系的时候是系主任助理，后来当了副系主任、总支副书记，实际上系里的教学工作是我一手抓的。我的工作在全校来讲都是不错的。我到历史系的时候还不是讲师，后来就要聘我当讲师。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不愉快了，认为我得到的好处太多了，挡了他们的路。再比如在1964年因李秀成问题受到批判之前，教育部曾经考虑调我去当主管文科科研工作的处长。其实当时对于这个调动，我自己是不大愿意的，我的兴趣并不在此，我还是希望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但是有人就嫉妒了，说茅家琦在学校里当党总支副书记，一下子调到教育部去当处长怎么行呢？还有人联名写信向学校党委和师资科反映，说我“只专不红”，“个人主义”严重，不能调到教育部去。

其实当时叫我去到教育部去，我也不一定去的。我的兴趣并不在此。不过当时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跟我勾心斗角。后来我才逐步意识到系里的人事关系十分复杂，很多人都有一种很微妙的心理：有了什么好处，我们大家都得不到可以，机会浪费了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你得到了而我得不到，心里就不舒服。

我受到批判以后，一开始是想不通的，第一个，我搞“清史研究室”有什么错呢？再一个，你批判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应该先教育我一下，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如果我不接受你的教育，你再来批评我，这样我才会心服口服。你事

先也不教育一下，就这样往死里整我，这个是很难接受的，这叫“不教而诛”。我一开始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一步。

后来我想想，第一，我确实对政治不感兴趣；第二，我确实写过关于李秀成的文章。那么按照当时的主流看法，说我走“白专道路”，说我是“叛徒的辩护士”，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辩白的，所以你要批就批吧。因为我过去也这样批评过人家的。

值得庆幸的是，后来南京大学整人的情况没有中学那么厉害，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老师、干部所受的苦难没有中学那么厉害。南京大学文革初期基本上没死人，个别人是个别情况。据我了解，南大没有人是被造反派打死的。中学里面的情况就不同了，有很多老师、校长被学生打死了。

在我的印象中，南大文革早期自杀的几个人完全是别的原因。但是到了后来清查“五·一六”南大死了很多人。清查“五·一六”不是整“走资派”，也不是搞“反动学术权威”，而是搞“造反派”，是“造反派”的内讧。军、工宣队插手以后，整得很厉害，波及了很多。

那么既然南大造反派兴趣在省委，对校内的许多问题就放松了，所以文革爆发两三个月以后就没人理睬我们了，造反派就让我们去劳动。有的到工厂、农村去劳动，有的在学校里劳动。有的时候偶尔也把我们弄去批判一下，不过这种批判也没什么新东西，都是些陈年旧账，所以批的人和被批的人都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就比较清楚，文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我们当时的思想还是比较单纯的，心里还在想：怎么一下子就对我们不感兴趣了？

另外从这个事情我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问题，就是“杀功臣”的问题。第一把手要巩固政权，他怕人家把他搞下台，所以一旦怀疑某人对自己构成威胁，他就要加以清洗，就要搞那些遭到怀疑的人，而且一搞就要往死里搞。中国的传统政治就是这么回事。

董国强：文革期间您有没有关过“牛棚”？

茅家琦：关过。那个时候叫“集中管理”。我们的“牛棚”是系里面建的，就是在学校里面找了个空房间，把几个“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路线黑线人物”、有历史问题的人从家里弄到学校里来住。开始我们住在学生宿舍里面，我们这些人全都在一个房间里，门窗都钉起来，钉得很严实的，屋里面黑漆漆的。上午、

下午劳动，就是在校园里搞搞卫生，扫厕所，扫马路。吃饭的时候排队到食堂去打饭。每天还要读“老三篇”，读《毛选》，读毛泽东语录。我们还在一个地方住过，就在现在的南苑宾馆的后面，过去有一个日本人留下的铁皮房子。第三个去过的地方是到溧阳。我们吃的苦还不是很厉害的。

董国强：你们关“牛棚”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茅家琦：大概是从1967下半年到1969年初。1966年还没有住“牛棚”。文革一开始对我们管得很紧，后来到1967年初就松下来了，因为造反派很快就搞到上面去了，底下就放松了。不过到1967年底至1968年又厉害了。最高潮是1968年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记得很清楚的，1968年秋冬以后，就把我们送到大桥工地劳动去了。

我最难受、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就是在大桥工地劳动。那个时候活很重，叫我们扛枕木，从码放枕木的地方扛到正在建造的路基上去。我的身体很单薄，扛一条枕木已经很吃力了，但是一个造反派讲：“你是‘黑帮’，你得扛两条！”叫我扛两条枕木我哪里受得了啊？那个枕木大概有三米长，这么粗（约直径10cm），两条枕木放到我肩上，我走了没有几步，就眼睛发黑要晕倒了，幸亏我硬挺住到了地方。那一次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我当时昏倒了，那个枕木砸下来肯定要受伤的。这是我自己最难受的一次，所以我记得很清楚，讲这个话的造反派是谁我都记得，呵呵……

当时学生里面有个“红四联”，就是“好派”，他们认为我没什么问题。“八·二七”，就是“屁派”，里面有一部分人认为我有很严重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我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好派”也不敢对我表示信任。“屁派”里面对我印象好的人，对我也没什么明确表示。反对我的是“屁派”里面的一部分人。现在我想，那些反对我的完全是个人原因。他们也知道我实际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因为我的存在妨害到他们了，所以对我有怨恨，一定要搞我。

据我了解，上面就是学校这一级的“造反派”头头，他们对我都没什么意见，认为没有搞的必要。我就是一篇文章、“个人主义”、“白专道路”这些问题。至于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这个问题的人多得很，全校干部都有这个问题。

我对自己的处境也比较清楚，我是一个“问题人物”，必须处处小心谨慎，免得招惹麻烦。所以我平时该劳动就劳动，不劳动的时候就回家。我大体上知道

我们系“好派”、“屁派”、“促联”的情况，不过我也知道我不能插手进去，我插手以后就变成“黑手”了。操纵“造反派”的罪名对我自己不利，对“造反派”也不利。我当时自己也有一个衡量，我就这么些问题，那么这个运动总是要过去的，只要我在运动中没有什么新的问题，最后总归要“解放”的。

董国强：真正想打倒你的人不是学校一级和其他单位的，而是本系的。也就是说，在系里面的矛盾更尖锐一些。

茅家琦：是的，系里更尖锐一些。

董国强：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全局的角度看，文革的主要动力不是来自上面，而是来自本单位内部？

茅家琦：是的，就基层情况而言，整谁、不整谁，关键在本单位内部，而单位内部的问题很多是由个人恩怨引发的。

董国强：您刚才提到以往您也批判过别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种所谓的“学术批判”，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您能否谈谈涉及到哪些具体的人和事？

茅家琦：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我也批判过我们系里的教授，就是王绳祖、蒋孟引、王棣、陈恭禄等人。我现在还感到内疚。

董国强：那个时候您参加这种批判的动机是什么？

茅家琦：当时我的确认为他们错了。你知道，解放以后我的确相信马列主义，我读过很多马列主义的书，《资本论》我是花了很多时间来读的。因此我当时相信马、恩、列、斯、毛的话。那么以此作为参照，我认为很多专家学者解放前的著作全是错的，比如王绳祖教授、陈恭禄教授等人解放前写的书，以当时那种眼光一看就明显是反动的。当然现在看来我当时的观点是教条主义的。

当时批判也很简单，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教条来对照那些教授们的著作，指出他们的问题。不过都是口头批判。另外一点，当时政治运动一来大家总是要参加批判的，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我还是非常小心的。比如陈恭禄先生解放前写过一部《中国近代史》，当时影响很大的。解放后人民出版社向他约稿，要他重写《中国近代史》。他写了第一册《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交给出版社，审稿的时候被认为有严重错误。学校里将这个审稿意见转给历史系党总支，叫系里来处理这个事情。总支书记拿着这个意见让我看，我一看那个意见提得非常尖锐，书稿肯定不能用了。那么我的意见是书稿不能用就算了，也不要进一步追究了。所以

这个事情后来系里根本就没有展开批判，也没有其他人知道这回事。

董国强：这个事情大概发生在什么时候？

茅家琦：1960年。

董国强：如果当时不是您主张压下来，这个事情会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

茅家琦：是的，可能会闹得很大。

另外，1957年“鸣放”时期，我们系有很多人讲了很多当时看来十分错误的话，我根本就没反映。所以有人说我在“反右”的时候害人，那都是莫须有的。

董国强：您到什么时候就比较自由了？

茅家琦：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有两个事情我的印象比较深，第一个是让我跟大家一起参加一些零散的劳动，基本上不批判我了。第二个是“九大”前后，工宣队把我跟其他几个人一起调到浦口的一个仓库里面去办“学习班”。那时候到“学习班”实际上已经等于“解放”了，在“学习班”就是学习提高，不是交代问题。不过有一次讨论的时候，有一位同志很认真地对我讲：“茅家琦，你还是要交代问题的，你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呢！”

我当时确实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历史系把我卡在那里，不让我恢复组织生活。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有人想卡我。他们在背后怎么议论我的，我都知道。他当面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就老是重复那么一句话：“你呀，别生气，好好考虑交代问题。”后来工宣队就讲：“我们现在办‘学习班’不是来交代问题的，而是来提高认识的。”这说明当时工宣队感觉到我没有问题。这是“九大”前在浦口。

还有一个问题在这里说一下。解放前后，南大地下党里曾经有人认为我有“特嫌”——就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嫌疑”。他向我们的团支部书记反映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的团支部书记就在我的一個登记表上写了“该人有特嫌”这么一句话。我是在找一位指导老师谈话的时候，偶尔在他的桌子上看到了这个表格和组织意见的。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国民党特务，所以当时我根本没有理会这个事情。结果就因为这么一句话，在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对我调查得很厉害。究竟这个“特嫌”的依据是什么，后来组织上怎么进行调查的，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当时找了很多了解情况，搞了很长时间，最后的结论大概是：那个地下党提出过他的怀疑，但是他并没有证据。这个地下党后来被分配到东北，1957

年被打成“右派”。

董国强：这个“特嫌”问题发生在……

茅家琦：解放初，当时我已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了。1952 年我参加了共产党，还当了干部，也就没在意这个问题了。

所以现在想想，我们过去的这个档案制度真是害人啊，像这种无凭无据、似是而非的东西弄到档案里头，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啊。

董国强：您是因为偶然看到那份表格，所以您自己心里有数了。可能还有许多人有类似的情况，而他们自己根本不知道。

茅家琦：是的，有的人可能遭遇到这种情况，而自己根本不知道。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自己是会被整的，整过以后是要处理的，不过文革一下子搞到上面去，这么搞法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所以一度也十分困惑。但是我当时在某些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比如除了劳动以外，我基本上不参加任何活动，**决不和别人交往，包括系里的、学校的我都不与他们交往**。当时“好派”、“屁派”来找我谈话，向我透露他们的看法，让我表态，我始终没有表态。因为我知道一旦表态，对我自己不利，对他们也不利。因此后来没有人指责我在历史系插手哪一派。我明知道很多人对我的印象不错，但是我在他们面前不发表任何看法。当时“屁派”里很多人对我印象很好的，要解放我，但是我决不和他们联系。这样任何人都抓不到我的把柄。“清队”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大问题。

文革期间我想得最多的一条就是“不教而诛”。干部犯错误了，你应该告诉人家怎么改。你不教育人家，不给人家改正的机会，就一下子把人家撤掉了，这是招致我反感的地方。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文革期间“不教而诛”的症结在于单位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所以我当时想：算了，随你怎么处理，大不了教师这一行我不干了！我当时才三十来岁，我想了一下子，最好的工作是当个裁缝，踩踩缝纫机，缝缝衣服，比较单纯，也比较适合我的身体条件。其他太重的劳动我干不了。

但有一条，当时对马列主义还是坚信的，“阶级斗争”理论还是相信的。由此可见，真正摆脱一种思想影响是很不容易的。

我在 1968 年还受到两个打击：我的一个妹妹在农村的小学里当教员，暑假的时候自杀了。紧接着我父亲在 8 月份也自杀了。

董国强：您当时有没有想到，因为过去写文章受过冲击，就不写或少写文章呢？

茅家琦：我当时经过“李秀成事件”这番折腾，感觉到反正就这么回事，以后写文章出问题充其量也就是这样了。另外一个，我相信学术事业终归要发展的。所以我对我的小孩讲，你们终归是要读书的，多读点书迟早是有好处的。我的老二茅宁高中毕业到农村去，我多次对他说，你到农村去，千万不要把学习丢掉，多读点书迟早是有好处的。

【蓦然回首】

1970 年春节的记忆

黄昌国

1970 年春节是我从重庆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在重庆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以后的春节都是在江苏过的。因此那年春节我印象特别深刻，最记得这样三个内容：

1. 我无意中记录下了 1970 年春节重庆城市居民的供应情况：

重庆城市居民每人供应猪肉一斤，红糖二两，汤元芯子四两，糯米一斤，白酒半斤，菜五至七斤，带鱼三两。（菜 5-7 斤，具体是菜市场先卖萝卜，每人 5 斤，萝卜卖完了就卖瓢儿白，每人 7 斤。）

2. 我一个高中同学，当兵去越南打美国鬼子回来了，他是 54 军一个高射炮连的指导员，他讲了在越南作战的故事：美国飞机飞得很高，在地面根本看不见，也听不到声音。他们高炮连在越南分配包干了一片天空，上面叫打，就朝自己包干的那片天空开炮，有一次炮轰了一夜，美国飞机影子也没看到。我想，每片天空都有人包干打炮，美国飞机也难飞的吧？

3. 春节（正月初一）那天，沙坪坝街上人很多，有些商店还卖粘胶布（化纤布），不要布票，只收工业票。还有鞭炮卖，筷子头粗的价格是两角钱 28 枚，

“群众专政大军”（注：当时官方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按照毛泽东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指示建立的一个集治安、城管等职能于一身的组织，从各单位抽调“家庭出身好”、“政治可靠”的青壮年组成，被群众讥称为“专政群众大军”）在街上巡逻，监视人们的衣着打扮：不准戴黄帽子（注：指无帽徽的军帽，是文革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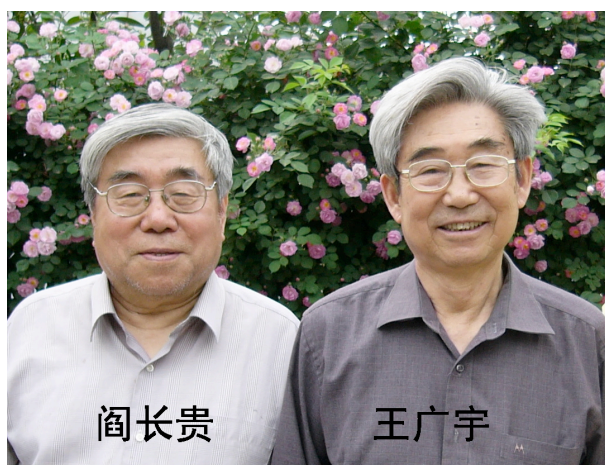
期流行的“红卫兵”装束。60年代末重庆市内曾一度出现抢军帽风)；穿小裤脚的(注：当时视小裤脚为流氓阿飞专用打扮)，要被强行用剪刀剪破成两片；不准穿白鞋(注：指白色体操鞋，当时被认定是流氓阿飞才穿的鞋子)，抓住后就逼迫其脱掉打赤脚；不准梳亮脑壳(注：指头发上擦油，当时被认定是流氓阿飞打扮)，捉到了用理发推剪在他头上乱推；不许留长胡子(注：当时认定留长胡子是思想颓废，对现实不满)，抓住当场刮掉。我看见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在念《关于胡子的问题》的书面检查，他嬉皮笑脸，围观群众听得捧腹大笑，有趣极了。“群众专政大军”的小伙子们也越干越起劲，四下里搜寻，像做“猫捉老鼠”游戏一般，为节日增添了愉快的气氛。

【简讯】

一部原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的回忆与研究专著正式出版

宇 锋

近日，阎长贵、王广宇合著的《问史求信集》一书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收集了两位作者近年著述的各类文章57篇，计44万字，其中18篇为首次公开发表。



两位作者先后担任过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阎长贵还曾是江青首任机要秘书(1967年1月——1968年1月)。两人都曾蒙冤系狱多年。该书内容既有作者亲身经历，也有他们反思历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其中部分观点和史实对以往官方史著和坊间传闻进行了大胆的突

破和如实的澄清，对还原历史真相具有极为重要的积极意义。在文革研究被视为禁忌的现实环境中，该书由红旗出版社公开出版，格外引人注目。

(《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著，红旗出版社 2009 年 4 月出版，书号：
ISBN 978 - 7 - 5051 - 1754 - 9，450 页，定价：58.00 元)

【文摘】

也谈王白旦的故事

陈益南

3 月 5 日的《南方周末》刊发了程树榛先生的《一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程先生是原《人民文学》主编，文章自然写得生动流畅，所述的故事也颇有趣，一个曾经的中央委员及钢铁工人所具有的荒诞历史，无疑是很吸引读者眼球的。但历史不是文学，程先生的这篇文章，读来令人感觉写得太随意了。

首先，这篇《故事》公布的王百得之履历，就不正确。该文说：“他本名叫王白旦，是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闯关东的农民。当时，因为‘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好多人都吃不饱饭，甚至连树根树皮都扒下来充饥，还是解决不了饿肚皮的问题，于是，人们便纷纷外逃，寻找生路。那时，黑龙江省的北大荒地多人少，成了人们逃荒的首选之地。王白旦就是这样随大流来到北大荒的。正好赶上某钢厂刚刚兴建，需要大批劳力。于是，王白旦就这样幸运地进入了某钢厂。”事实到底如何呢？权威的《历届中共中央委员大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中是这样介绍王百得的：“王百得：男，汉族，1934 年 5 月生，河北井陉人，曾用名王白旦，1958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 年 9 月参加工作，初中文化。1951 年 9 月至 1956 年 3 月为太原钢厂工人。其间：1954 年 12 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 年 3 月至 1969 年 2 月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工人。”这清清楚楚地说明了，王白旦在未去东北前，已经是太原钢厂有 5 年多工龄的工人了，他之所以到了东北，成了齐齐哈尔钢厂的工人，不存在《故事》所说的什么“幸运”不幸运一说，显然，王白旦当年是奉调去的，其连续工龄没有出现一天的中断。

其次，王白旦如何成为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一事，《故事》说是即将召开中共“九大”前，“一个绝密通知从上边传到”王白旦所在的钢厂，“要求这个厂选派一名有 7 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参加大会”，而这个厂的造反派骨干们，

因近期正准备成立厂革命委员会，他们都不想在这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离开工厂，因此讨论了很久，这名代表名额还落实不了。最后才决定选派王白旦去北京参加党代会。而后来，王白旦在“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了，这些造反派头头（“核心组”）又后悔得要死，怨自己没有远见云云。

实际上，当年指派出席“九大”的代表，其程序，并不是给下面什么单位一个代表“名额”，由这个单位自己去选定，而是由省一级党的核心小组（当时全国各省革命委员会，基本都建立了相当于省委的党的核心小组）与下面各地市革委会及党的核心小组，按中央的要求标准，反复协商才产生的。在湖南省，当时为选定出席“九大”的代表，1969年2月起，就召开了全省党员代表会议，一百三十多人花五十多天，专门来一个一个审定参加“九大”的代表，最后，还要报中央批准才算数。一个工厂哪有什么权力，来确定本厂派出参加“九大”的代表！而这些代表，即便是来自基层的工人，也不是一般的党员，而是当时有了一定职务的造反派工人。“九大”前，王白旦就已经是厂革委会的副主任了，并不存在“近期准备成立厂革委会”之事。并且，当时中央对“九大”代表的资格，也根本没有什么“要求七年以上党龄”的规定，上海、湖南就有仅仅只入党几个月的党员（当然是造反派头头），也被选定为“九大”代表。

可见，《故事》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只是在想当然耳。

此外，关于陈伯达、江青为王白旦改名的事，《故事》如同早几年便流传过的说法一样，讲得有枝有叶，有板有眼，蛮好看的。问题是，这说法来自何处？二次改名，牵涉到二次中央会议，这讲故事的人究竟是当事人，还是真正亲历了历史的记者？至今未见有人说明。《故事》的作者袭用这样的传说，又没有提出证明故事真实性的根据，为文有欠严肃。

摘自 2009 年 3 月 12 日《南方周末》

【小资料】

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钟 逸

1968年1月18日 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复了空降兵15军党委兼武汉警备区呈报的《关于建立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成立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方铭、杨春亭、张昭剑、李长根、张绪、赵奋、刘文科、薛朴若、杨友山、张珉、王敏青、孙锡成、刘海江、阎超山、李全智及群众组织代表19名，机关干部代表2名，共36人为市革委会常务委员，由方铭任主任，杨春亭、张昭剑、李长根任副主任。20日，市革委会正式成立，全市举行50万人参加的成立和庆祝大会。武汉市革委会成立后，宣布“一切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归革命委员会，原市委、市人委以及所属部委，办、区、局的公章一律作废”。（转引自武汉党史网《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

1968年1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下设办公室、政治部、生产指挥组、文革领导小组，取代原市委、市人委各部、委、办职权。3月13日，根据湖北省革委会批示，武汉市革委会所属各局不成立革命委员会，只成立革命领导小组。

3月22日，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会议决定，撤销市革委会办公室、政治部、生产指挥组、文革领导小组，重新设立革委会“四大组”，即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后改称政法组)。

办事组下辖行政小组、秘书小组，组长为刘海江（军队干部）。行政小组组长为焦光寿（军队干部）。办事组主要负责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政工组组长为阎超山，后由张景禄（空降兵第45师副政委）接任，下辖政法小组、机要小组、宣传小组、机关小组等。宣传小组组长为车成德（军队干部），机关小组组长为任善纪（军队干部）。政工组主要负责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人事组织、干部调配、任免等工作。

生产指挥组组长为李全智。副组长为王敏青。生产指挥组主要负责全市工农农业生产的组织、指挥和协调工作。

当时武汉市公检法军管会单列，负责人为刘文科（军队干部），后列入市革委会政法组，刘文科任组长。政法组主要负责全市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工作。

5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根据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精神，重申一切党、政、财、文大权统归市革委会，原市委、市人委及所属各部、委、办、局的公章宣布作废，并收缴封存。

按照当时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实行三结合的要求，武汉市革

委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 任：方 铭（空降兵 15 军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员）1968.1-1973.1

副主任：张昭剑（空降兵 15 军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1968.1-1973.9

张 绪（空降兵 15 军副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1968.10-1974

杨春亭（原宜昌市委第一书记、支持造反派的干部）1968.1-1970

李长根（原中原机械厂党委书记、支持造反派的干部），1968.1-1970

李想玉（武钢机械总厂工人、钢九一三一号勤务员）1968.2-1970.6

吴焱金（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工造总司一号勤务员）

1968.2-1976.10

孙锡成（武汉市人民武装部部长）1968.9-1976.10

伍能光（原武汉市副市长）1968.10-1976.10

常 委：刘海江（军队干部）兼市革委会办事组组长

阎超山（空降兵第 45 师副政委）兼市革委会政工组组长

李全智（空降兵 15 军后勤部长）兼市革委会生产组组长

赵 奋（陆军第 29 师师长）

薛朴若（原武汉市副市长）

张 珉（原市人委副秘书长、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王敏青（女，原武钢党委组织部部长、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刘文科（军队干部）兼市革委会政法组组长

张 彬（原武汉市委机关干部）

杨友山（武汉电信局局长，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魏绳武（市直红司一号勤务员，原武汉市农委副科级干部）

沈复礼（武汉锅炉厂技术干部、钢工总常委）

李洪荣（武汉锅炉厂工人、钢工总常委）

张耀忠（武汉列电基地工人、钢工总常委）

胡崇源（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钢工总常委）

曹佩贤（武钢机械总厂工人、钢九一三常委）

龙克发（武钢工人、钢九一三常委）

王锦铭（武汉低压锅炉厂工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

田学群（原武汉市公安局侦缉科长、公安联司一号勤务员）

丁家显（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

王彩珠（女，华中师范学院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

柳英发（省武昌实验中学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

雪湘明（武汉师范学院学生、三司革联二号勤务员）

张维荣（湖北大学教师、新湖大临委会负责人）

郭保安（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一号头头）

高玉泽（华中农学院学生、新华农东方红总部一号头头）

陈文汉（武汉市一中学生、中学红联二号勤务员）

按照《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提供的数字，1968年元月成立的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应是36人。以上仅收录1968年10月为止的任职人员。以后市革委会常委又陆续有所增补，如1970年1月增补的副主任韩宁夫、王克文，1971年4月增补的副主任田文，1973年先后增补的副主任刘惠农、谢滋群、熊飞、王杰、张文斗、黎智、赵敏，增补的常委聂年生（新华工勤务组成员，华中工学院学生），1974年先后增补的副主任邓垦、薛朴若、孙荣章，1976年9月增补的副主任王家吉等。为保留市革委会成立时各类人员的比例和原貌，此处均未收录。

市革委会委员因参加活动较少，相关资料难找，目前仅通过一些当事人回忆搜集到部分委员的名单。

委 员（部分）：

崔放鸣（原市财政局局长）

宋匪石（原市委副秘书长）

张连启（原东西湖农垦局局长）

曹承义（新一冶一号头头，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技术干部）

余金玉（女，钢工总供电局头头，供电局干部）

方 斌（钢工总组织部长，武汉客车厂工人）

谭光前（钢工总武汉肉联厂一号头头，武汉肉联厂工人）

吴正彪（钢工总工业安装公司一号头头，武汉市工业安装公司工人）

袁先和（钢九一三勤务组成员，武钢机械总厂工人）

郑发兴（钢九一三勤务组成员，武钢初轧厂工人）

李家华（钢九一三勤务组成员，武钢焦化厂干部）
陈长洋（钢九一三头头，青山热电厂工人）
孙厚智（红色革命敢死队一号头头，武汉市安装公司干部）
陈永和（工造总司武汉肉联厂头头，武汉肉联厂工人）
陈贻民（工造总司武汉机床厂头头，武汉机床厂工人）
李少斌（工造总司基层头头，武汉市二轻局某加工厂工人）
丁喆生（红工一号头头，武汉精细医疗器械厂工人）
柳士康（红学员一号头头，武汉汽车发动机厂工人）
张 军（红卫军头头，大桥工程局干部）
徐筱芳（女，三司革联三号头头，武汉医学院学生）
杜向东（毛泽东思想红工兵一号头头，武汉邮电学院教工）
周继红（学生）
牛占彪（市直红司头头，原市人委人口办公室干部）

【编读往来】

一、本刊今年第十期编读往来中转载李自茂《评王广宇的“桀骜不驯的蒯大富”》一文后，王广宇写来《闻者足戒》一文作为答复，如下：

4月10日，我收到友人转来李自茂先生的《评王广宇的〈桀骜不驯的蒯大富〉》文章。李先生对拙作中关于蒯大富印象形成的两件事未置评论，着重对文中概念使用的准确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即使用语尖刻，我仍视为逆耳忠言，接受李先生的正确意见。据我推测，李先生可能受到过误解甚至伤害，有“气”要出，完全可以理解。

《桀骜不驯的蒯大富》一文中确有不准确、不严谨之处。李先生提出批评质疑的重点是第一段：即蒯大富成名的背景和过程。蒯大富从“反革命”到“造反派”再到“革命造反派领袖”的历程。分歧之一是蒯大富是谁给平反的，我在文章中说，中央文革小组给蒯大富平了反，李先生说是周恩来总理在清华大学的两次大会上

宣布给蒯大富平反的。据我所知，蒯大富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后关在禁闭室中，中央文革小组派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冒着风险到清华禁闭室探访蒯大富，因为把蒯打成反革命的是中央和北京市派出的工作组。王、关和蒯交谈后，经文革小组研究，认为蒯不是“反革命”，并向当时党中央报告此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宣布为蒯大富平反。

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蒯大富在文革后的回忆不谈王力、关锋找他谈话，是情理中事。据蒯本人回忆，7月31日（即十一届十一中全会前一天）凌晨2点至5点、晚7点至10点，周恩来听他单独汇报了6个小时，并称“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现在看，为蒯平反，是毛泽东进一步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一个具体步骤，周也好，中央文革也好，都是具体执行者，决策权在毛。

我在文章中，叙述蒯大富起家过程，使用的“一夜之间”之词，不是一个算术概念。文章中说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在各地“横行”，各地发生的“打砸抢抄抓”事件“几乎”都有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的“影子”，这些表述是不准确，不周全的。关于清华“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宣布成立的时间我真不知道。我没看过清华大学红卫兵发展史和它的大事记，我只把“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作为蒯大富领导的那些红卫兵的广义的概念在使用，是代指或泛指。至于对领导成员的称谓，我也是使用了普遍的概念，以为都应叫“勤务员”，因这种职务并非官，而实际上北京的各高校造反组织很多，领导成员的称谓又是自封的，五花八门很不统一，我使用了“勤务员”的概念和清华井冈山红卫兵领导称谓“总部委员”对不上号，这是我的粗疏。

不能回避的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文革初期，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中，确实起了先锋作用。此后清华红卫兵走出校门杀向全国，帮助各地红卫兵

造反，在大串连、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走资派”等活动中，清华大学红卫兵也起了“火种”作用。在全国各地设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联络站以及以各种名目派出的支持各地造反的队伍也为数不少，我说的在各地发生的事件中几乎（准确地说，是“很多”）都有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的“影子”，这些情况中央文革的刊物上都有记载。应当指出，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在各地的作为，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大多都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和鼓励，甚至指使，账不能全算到红卫兵头上。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于 1966 年 8 月在中南海西门接待室召集清华大学红卫兵代表开座谈会的事，我在行文中虽然用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概念不准确，但不能因此否认确曾开过这个座谈会。会议的内容我再次回忆，可能就是为了召集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的代表人物谈文化大革命如何搞，目的是观察清华红卫兵未来领导成员。中央文革小组研究这个座谈会后对与会代表的表现作过议论，其中包括对蒯大富的议论。李先生让我把记录拿出来晒晒，我拿不出来，因为我离开中央文革时是“净身出户”。如果李先生坚持要看，去中央档案馆或中央办公厅查，也许能查到。

我怎么想起写蒯大富呢？几年前，在一次访谈会上主持人让我谈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五大红卫兵领袖”的印象，其中谈了蒯大富，其实我同蒯大富直接接触不多，只同他打了两次交道，这两次都碰了钉子，我的印象很深。后来我整理成文，加上了《桀骜不驯的蒯大富》的标题。我只记述了同蒯大富接触的情况，我当时就感觉，蒯大富的地位变了，从一个普通在校大学生到管理上万人的高等学校，“官升脾气长”，官气、傲气、牛气滋长，凡人不理（蒯本人如今也不讳言当时他“得意忘形”）。我是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执行传达任务，

蒯大富作为清华大学实际负责人，这是工作关系，并非我俩的私人关系，蒯不理我使我的工作受阻。对工作上的挫折记忆犹为深刻，我想这也是常理。这正是李先生所说为这点小事，竟然“耿耿于怀”，“四十年不忘”的原因。

我绝无为中央文革辩护，“保护一小撮”之意。否定文化大革命必先否定中央文革，毛泽东直接领导的中央文革是文化大革命的“前指”，是动乱之源，罪恶昭彰。我的一本尚待出版的回忆录书名就叫《风来自钓鱼台》，是专门揭露中央文革的错误和罪行，交代自己的错误和罪过的，那本书中都有我的“影子”。

我写了几篇回忆文章，目的是给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提供点参考资料和线索，个人回忆难免有疏漏，我绝没有把它当成“信史”的奢望。我一向认为，回忆和历史不完全是一回事，历史不能仅仅根据回忆录来写，更不用说回忆录要受作者的利害、情感、心态和记忆等因素的影响。真正的历史要以经得起推敲的详实的史实为依据，这一点我和李先生没有分歧。

最后，我解释一下，我是一个凡得不能再凡的凡人，绝非名人，我这辈子几乎都是在逆来顺受中活过来的，“夹着尾巴做人”是我一生的信条。不信去问问和我共过事的人（包括李先生指责的“炙手可热”的那一段）。

我顺着李自茂先生的思路作了以上答复，有检讨，也有解释。大家尽量避开受感情驱使的心态，心平气和，有错就改，尤其不要意气用事，脏话成文（比如“牛 B”云云），形成一个实事求是的风气，服从真理，相互切磋，为建设和谐社会尽微薄之力。

2009 年 4 月 13 日

二、读者庄瑞菁就《官僚制与文革》一文（丁学良撰写，本刊今年 11 期摘登）

谈到的印尼式民主发表不同意见，如下：

这一期当中的《官僚制与文革》一文，里面提到了民主的四种方式，最后一种，也是作者提倡的一种，谈到了印尼。个人认为，印尼的政治体制和我们的很不同，不能作为理想的参考，或者照搬。而且，印尼的民主也太低级，如果中国走印尼的路，要想达到民主社会，不知要走多少年。这种方式，纯属改良思想，是清末康，梁方式的变种。我不是赞成革命，使用暴力来更替政权，成本太大，而且结果很可能是与初愿相违。中国的这 100 年来的实践，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要说的是，为什么不参照台湾方式，以台湾为榜样？台湾式民主虽然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毕竟是我们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管理的第一个成功案例。而且，台湾的实践成果，比印尼的不知要好上多少倍。舍近求远，不是我们应取的态度。

三、读者马小星来信，谈到杨银禄写的《我见到的江青三次流眼泪》一文（本刊今年第一期）被转载的情况及其感想，如下：

上星期我在福建一文摘报上，看见转载自《各界》杂志的一篇文章，标题十分显豁：《江青曾建议改善陈景润生活条件》，作者杨银禄。其实就是《记忆》今年第 1 期上《我所见到的江青三次流眼泪》的第三节。想不到这样的文章也能公开发表。年初在《记忆》上读到杨银禄此文时，我们就认为是一篇好文章，因为他没有把江青妖魔化，而是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尽管她在权力巅峰时颐指气使，尽管她带有神经质的心血来潮，但她仍有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至少夜访程砚秋家属和为陈景润呼吁这两件事是做得对的。我以为，论个人素养，江青比当下一些女演员要好得多，她后来的变化，是被制度毒害而造成的。另外，江青在五十年代初可能受了什么刺激，发生了精神疾患（原因至今不明）。谁把这样一个精神上不健康的女人弄进政治局的，让她去充当马前卒，谁就该负完全责任。记

录历史要客观真实，评价历史人物要公正，不能把一部分人妖魔化，又把另一部分人神圣化。我们所以喜欢阅读《记忆》，就因为它勇于面对真实的历史，不遮掩丑恶的一面，也不为尊者讳。

2009-5-5